

分类号: K1
密 级: 公开

单位代码: 10451
学 号: 2020110127

鲁 东 大 学

学 术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美国犹太组织：圣约之子会研究（1843-1948）

作 者 姓 名	李 洁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张淑清 教授
学 科 专 业 名 称	世界史
研 究 方 向	世界地区与国别史
论 文 答 辩 日 期	2023 年 5 月 18 日
答 辩 委 员 会 主 席	谢国荣 教授

鲁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美国犹太组织：圣约之子会
研究（1843-1948）

作者姓名： 李洁

指导教师： 张淑清 教授

学科专业： 世界史

研究方向： 世界地区与国别史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二〇二三年五月

A Thesis Submitted to Ludong University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Study on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 B'nai B'rith
(1843-1948)**

M. D. Candidate: Li Jie

Supervisor: Professor Zhang Shuqing

Major: World History

Research Interests: World History of Regions
and Countries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udong University

May, 2023

目 录

引言.....	1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
(一)研究背景.....	1
(二)研究意义.....	1
二、研究现状.....	2
(一)国内研究.....	2
(二)国外研究.....	4
三、研究方法.....	9
四、创新点.....	9
第一章 圣约之子会的建立与发展.....	10
一、圣约之子会的建立.....	10
(一)圣约之子会的建立背景.....	10
(二)圣约之子会的宗旨和使命.....	13
二、圣约之子会的发展壮大.....	15
(一)主要附属机构.....	15
(二)主要分会组织.....	23
第二章 圣约之子会的主要活动.....	28
一、保卫犹太人的权利.....	28
(一)打击反犹主义.....	28
(二)实行人道主义救援.....	33
(三)捍卫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主权.....	37
二、帮助和服务犹太社区.....	44
(一)关爱老幼生活.....	44
(二)创办教育事业.....	46
(三)开展职业培训.....	49
三、参与国际事务.....	50
(一)参与联合国事务.....	50
(二)开展国际救援.....	51
(三)支持以色列作战.....	53
第三章 圣约之子会的主要影响.....	55
一、对犹太人的影响.....	55
(一)团结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55
(二)改善了犹太人的生活状况.....	57
(三)增强了犹太人的身份认同.....	60

二、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62
(一)影响了美国的犹太移民政策	62
(二)提升了美国犹太人的政治地位	64
结语.....	66
参考文献.....	68

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 1843 年诞生于美国纽约市的一个犹太组织：圣约之子会。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犹太人服务组织，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自成立之初起，圣约之子会就将领导和团结犹太人作为自己的宗旨和使命，并积极为犹太人的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本文旨在梳理圣约之子会的发展历程，重点探讨圣约之子会的主要活动，并通过其主要活动透析该组织对世界犹太人和美国政治的影响。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在篇章方面做出如下安排：

引言部分主要阐述圣约之子会组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梳理国内外学者对该组织研究的现状，说明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第一章主要介绍圣约之子会的建立与发展过程。第一，指出了美国犹太人在艰难的环境之下创建圣约之子会组织的背景，以及圣约之子会组织团结和服务犹太人的宗旨与使命。第二，本章还涉及对圣约之子会通过建立附属机构、分会组织，继而发展壮大的叙述，以小见大，洞悉整个组织的成长历程。

第二章主要探讨圣约之子会的各种活动。首先，圣约之子会以其在美国的总部为中心，通过打击世界各地的反犹主义思潮、实行人道主义援助、捍卫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主权等举措，切实保障了全球犹太人的权利。其次，圣约之子会密切关注犹太老年和儿童的生活状况，创办了各种教育和职业培训活动，以此来帮助和服务犹太社区。最后，圣约之子会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比如参与联合国事务、参与国际救援活动和支持以色列建国等。

第三章主要从两方面论述圣约之子会产生的影响。第一，该组织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团结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增强了美国甚至世界犹太人的民族身份认同。第二，该组织努力与美国政府交涉，对美国的犹太移民政策起到了影响作用，同时也提高了美国犹太人的政治地位。

通过对圣约之子会自 1843 年在美国成立至 1948 年以色列建国这段历史的研究，可以发现，圣约之子会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犹太组织，对改善美国乃至世界犹太人的生活、促进犹太公益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二战后，它积极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其他犹太组织接触，通过募捐筹款、政治争取等方式为以色列建国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圣约之子会，犹太人，犹太组织，美国政治

Abstract

This thesis mainly examines B'nai B'rith, a Jewish organization born in New York City in 1843. It is the oldest and largest Jewish service organization in the world, and has branches in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From the beginning of its establishment, B'nai B'rith has taken leading and uniting Jews as its purpose and mission, and actively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ewish caus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B'nai B'rith, focus on the main activities of B'nai B'rith, and analyze its influence on the world's Jews and American politics through its main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above considerations, this paper intends to make the following arrangements in terms of chapters:

The introduction mainly elaborate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organization of B'nai B'rith, comb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research on the organization,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innovation points of this article.

The first chapt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B'nai B'rith. First, it points out the background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B'nai B'rith organization by American Jews under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as well as the purpose and mission of B'nai B'rith organization to unite and serve Jews. Secondly, this chapter also involves the nar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B'nai B'rith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subsidiary institutions and branch organizations,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growth process of the whole organization from a small perspective.

The second chapter mainly describes various activities of B'nai B'rith. First of all, B'nai B'rith, with its headquar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center, has effectively guaranteed the rights of Jews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combating anti-Semitic thoughts around the world, implementing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defending Jewish sovereignty in Palestine. Secondly, B'nai B'rith has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Jewish elderly and children, and launched various educational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activities to help and serve the Jewish community. Finally, B'nai B'rith has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such as participating in United Nations affairs,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relief activities and suppor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Israel.

The third chapter mainly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B'nai B'rith from two aspects. First, the existence of the organization has to some extent united Jews around the world, improved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and, in a sense, strengthened the identity of Jew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ven the world. Secondly, the organization has made efforts to negotia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hich has influenced the Jewish immigratio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so improved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American Jew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B'nai B'rith from its establish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843 to the founding of Israel in 1948, we can find that B'nai B'rith, as a worldwide Jewish organization, has an indelible impact on improving the lives of Jew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Jewish public welfar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actively contacted the Zionists and other Jewish organizations, and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Israel through fund-raising and political struggle.

Key Words: B'nai B'rith; Jews; Jewish organizations; American politics

引言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圣约之子会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犹太人服务组织，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设有男、女及青年分支机构。该组织于 1843 年在纽约市成立，其活动包括保卫犹太人权、增进国际文化交流、满足犹太大学生的宗教和文化需求、主办犹太成人和青少年教育、支援医疗慈善机构、提供职业辅导、在以色列国内兴办福利事业、赈济灾民以及在各地广泛开展社区服务和福利工作等等。除此之外，圣约之子会还积极与各国政府首脑协商人权、移民、以色列的国际地位，以及有关全世界犹太人的其他问题，联合国犹太人组织协调局内也有圣约之子会的代表。^①在美国佐治亚州对圣约之子会成员的谋杀案审判使当地居民爆发出强烈的反犹太主义之后，该组织于 1913 年成立反诽谤联盟 (Anti-Defamation League, 简称 ADL)。1990 年，国际圣约之子会投票赞成接纳妇女为正式会员，作为一个自治的附属组织处理有关妇女的各项问题。自 1843 年成立以来，圣约之子会一直致力于为改善犹太人的地位和生存状况而服务，与此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慈善事业创新的源泉，它创立了医院、孤儿院、老年住房社区，举办了救灾运动、儿童安全倡议、成人教育、宗教宽容以及其他无数符合公共利益的活动。一直到今天，圣约之子会还在为世界各地的个人和社区服务。

（二）研究意义

首先，作为世界领先的犹太组织，圣约之子会致力于打击反犹主义，并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群体间的理解和宽容。圣约之子会在国际社会的重要问题上长期坚持其倡导，并通过它的国际人权和公共政策中心付诸行动。圣约之子会在纽约、日内瓦、巴黎、维也纳和圣地亚哥的联合国论坛以及欧盟、欧洲议会的代表们，积极与主要政府官员、知名商界人士和国家领导人合作，建立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盟。它积极倡导为老年人提供住房等人道主义援助和非宗派服务。因此，本组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其次，圣约之子会的中东政策包括打击恐怖主义、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支持中东冲突各方之间的直接谈判等，这对研究当代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

^① <http://www.bnaibrith.org/>[2022-11-27].

再次，圣约之子会的计划长期以来一直得到世界各地热衷慈善和具有前瞻性思维的个人和公司的支持。圣约之子会也承诺将继续作为历史最悠久、最有活力的非营利组织之一，为来自全球各个角落和各行各业的数百万人提供服务。这对于我们了解非营利组织的运作及其意义很有借鉴价值。

最后，作为一个在 19 世纪 40 年代诞生于美国的犹太组织，圣约之子会的成长也是与美国的发展相伴随的。通过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圣约之子会的诞生渊源、发展历程和主要活动。与此同时，通过圣约之子会的各项活动，我们可以进一步认清美国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而为理顺美以之间的国家关系提供新的思路。

二、研究现状

对于犹太史的研究，国内学者已出版和发表了许多有关犹太通史、文化和以色列史的著作和文章，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许多方面。对于美国犹太人及其政治地位的研究，汪舒明等学者也已发表过多篇（部）著述，其他多见于各高校的硕博毕业论文。而对于专门的犹太组织研究，国内著述还相对较少。相较于国内，国外的研究成果丰硕，针对犹太史设有专门的期刊如《犹太社会研究》《美国犹太人研究》《犹太历史研究》等。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每年都会出版《美国犹太年鉴》，回顾和记录当年发生的犹太大事件。

（一）国内研究

关于圣约之子会的活动研究，国内某些硕博论文有所涉及。戴燕玲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历史透析——以领导权视角为中心（1906-1929）》一文中指出，犹太人在定居美国的过程中，也运用结社的权利，逐渐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社团组织。在介绍美国全国性质的犹太组织时，提到了 1843 年建立的“圣约言之子”（B'nai B'rith），并且指出了“圣约言之子”在苏联犹太人问题以及打击反犹主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①。

杨阳在其博士论文《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关系研究》中，对“国际约言之子组织”（B'nai B'rith）做了简单的介绍，指出它已经是一个遍布 50 多个国家的国际性组织，为服务以色列的利益和解决中东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强调了国际约言之子组织为增强美国犹太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感展开的一系列活动^②。

^① 戴燕玲：《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历史透析——以领导权视角为中心（1906-1929）》，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

^② 杨阳：《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关系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

对于圣约之子会影响美国政治政策的研究,汪舒明的《战后美国犹太组织的“群际关系运动”及其影响》在介绍参与“群际关系运动”的主要犹太组织时,提到了1913年由“圣裔社”(B'nai B'rath)成立的“反诽谤联盟”,对其以不同的方式积极介入美国民权事务,与美国社会存在的对犹偏见和歧视等做斗争及其与非裔组织合作推进民权的历史进行了描写^①。

汪舒明在《犹太人在美国政坛的崛起》一文中指出,在实施“罗斯福新政”前,犹太人对美国社会政治的影响并不明显,只能通过媒体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JC)”、“反诽谤联盟”和“美国犹太人大会(AJC)”^②等若干“防卫”组织发挥间接影响。但是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美国犹太人与罗斯福的民主党结成自由派联盟,罗斯福也任命了多名犹太高级官员,因此,“新政”标志着犹太精英在美国政坛的强势崛起^③。

而对于圣约之子会影响美国中东政策的问题,国内也有某些硕博论文浅略涉及。孙铭若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对美以关系的影响》一文中,在介绍美以事务委员会出版的各种刊物时,提到了“圣约信徒会”(B'nai B'rith),指出它是以色列政治活动中的重要组织,能够帮助决策者和亲以人士分析中东问题^④。郝冬在《美国犹太人对美以关系的影响》一文中,提到了美国犹太人和亲以势力组成了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其中全国性团体就有圣约之子会、反诽谤联盟、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会(JDS)等,它们共同致力于以美关系的发展,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⑤。

在美以关系和美国犹太人地位研究方面,刘军在《美国犹太人:从边缘到主流的少数族群》中,以时间为主要线索,结合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等),对美国犹太移民的主要活动展开了描写。同时,结合以色列建国,对美国犹太人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也做出了研究,浅析了犹太人移民美国的动因,着重分析了美国犹太人的经济政治地位和宗教文化事业。此外,对于犹太人崛起的内外动因,作者也展开了相关论述^⑥。

李伟健的《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研究》从美国和以色列的国家战略、政治制度、

^① 汪舒明:《战后美国犹太组织的“群际关系运动”及其影响》,《史林》2017年第5期。

^②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英文为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简称 AJC;美国犹太人大会的英文为 American Jewish Congress,其简称也为 AJC。

^③ 汪舒明:《犹太人在美国政坛的崛起》,《中国民族报》2011年9月16日。

^④ 孙铭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对美以关系的影响》,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⑤ 郝冬:《美国犹太人对美以关系的影响》,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⑥ 刘军:《美国犹太人:从边缘到主流的少数族群》,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宗教和文化价值观、军事和经贸合作等方面，以历史与现实观察及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全面论述了美以战略关系的形成与发展^①。

通过以上的综述，发现国内不同学者对于该组织的中文名称翻译有着不同的见解。本文结合 B'nai B'rith 官方网站 (<http://www.bnaibrith.org/>) 中“children of the covenant”的注解，决定采纳弗雷德·A. 拉辛著，张淑清、徐鹤鸣译的《美国政治中的苏联犹太人之争——透视以色列与美国当权派的关系》中对“B'nai B'rith”的翻译——圣约之子会^②。

（二）国外研究

相较于国内的研究，国外学者对圣约之子会的研究更为详细。

1. 关于圣约之子会组织的起源与发展方面的研究

S. Z. 马德尼的《圣约之子会：盟约之子》介绍了圣约之子会名称的由来，从起初的兄弟联合会到最后敲定的盟约之子。而且圣约之子会作为一个非营利的组织，致力于深入了解和客观分析国际和平与地区安全，以及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同时，指出了它作为犹太复国主义性质的组织发挥的巨大作用^③。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发布的《进步组织：圣约之子会》^④和《独立组织：圣约之子会》^⑤介绍了圣约之子会的成立时间、组织公约、集会时间、主要领导者、办公地址、合作伙伴等，同时为正要举办的换届选举工作做准备，详细记载了各个分会以及每个分会组成情况和选举日期。

伯纳德·帕斯特的《圣约之子会：百年的服务历程》回顾了从 1843 年圣约之子会成立到 1943 年的百年历史，详细叙述了圣约之子会作为美国最早建立的有组织的犹太团体，在凝聚犹太移民、筹办慈善机构、创办学校教育、援助拯救难民等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和辉煌成就，着重介绍了圣约之子会的青少年组织希勒尔基金会及其发展理念——兄弟之爱（Ahavoth），仁爱（Tzdooch）以及和谐（Achdus），引发了社会对犹太教育和青少年的关注^⑥。

^① 李伟建：《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 年。

^② [以]弗雷德·A. 拉辛著：《美国政治中的苏联犹太人之争：透视以色列与美国当权派的关系》，张淑清、徐鹤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451 页。

^③ S. Z. Madni, “B'nai B'rith (Sons of Covenant)”, *Strategic Studies*, vol. 6, no. 4 (Summer 1983), pp. 92-94.

^④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Improved Order B'nai B'rith”, *The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vol. 2 (September 24, 1900 to September 13, 1901). p. 90.

^⑤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Independent Order B'nai B'rith”, *The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vol. 2 (September 24, 1900 to September 13, 1901), pp. 90-113.

^⑥ Bernard Postal, “B'nai B'rith: A Century of Service”, *The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vol. 45

马可·R. 纽马克的《圣约之子会在威尔希尔大道圣殿的聚会（1862-1947）》提到了犹太人在洛杉矶的威尔希尔大道圣殿聚会的传统习俗，以及参与集会的重要人物，并且以时间为主线，介绍了圣约之子会联盟与威尔希尔圣殿在相互发展过程中的紧密联系^①。

《我们的背后》新闻期刊中的报道——《圣约之子会开始接纳女性成员》指出：1990年起，妇女将成为圣约之子会的正式成员，作为一个有自己议程的全妇女自治团体开展各项活动^②。

2. 关于圣约之子会组织的分会机构和附属机构方面的研究

劳埃德·P. 高德纳的《圣约之子会——英格兰分会的五十年记录》分析了英国圣约之子会分会与美国圣约之子会的相似与不同之处，同时英国圣约之子会分会的活动又受到了美国圣约之子会的影响^③。

威廉·托尔的《20世纪20年代波特兰犹太人的唯意志主义与现代化在圣约之子会中的体现》以圣约之子会波特兰分会为例，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波特兰犹太社区的内部演变，从社区成员从事的职业可以看出犹太人地位的提升，而且内部各个社会阶层间冲突减少甚至消退了，成员们各奔东西，侧面反映出美国犹太人已经创造了使他们足够安全的经济基础，他们变得独立且非常富有，几乎不惧怕反犹太袭击^④。

摩西·R. 戈特利布的《美国犹太防御组织对纳粹德国清算圣约之子会的反应》针对1937年4月德国国家秘密警察突袭犹太组织圣约之子会，并勒令其解散事件，做出了一系列阐释，指出建立非犹太人组织以对抗纳粹的重要性。但是，在德国圣约之子会解散将近两年之后，美国的犹太防御组织才终于宣布了一项反纳粹的抵制运动^⑤。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发布的《圣约之子会关于美国犹太人大学生的报告》中指出，1935年，圣约之子会通过其希勒尔研究局(Hillel Research Bureau)对大学生

(September 30, 1943 to September 17, 1944), pp. 97-116.

① Marco R. Newmark, "Wilshire Boulevard Temple: Congregation B'nai B'rith, 1862-1947",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Quarterly*, vol. 38, no. 2 (June 1956), pp. 167-184.

② Cmk, "B'nai B'rith International Admits Women", *Off Our Back*, vol. 20, no. 10 (November 1990), p. 9.

③ Lloyd P. Gartner, "B'nai B'rith. The First Lodge of England. A Record of Fifty Years",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25, no. 3 (July 1963), p. 231.

④ William Toll, "Voluntar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Portland Jewry: The B'nai B'rith in the 1920s",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 10, no. 1 (January 1979), pp. 21-38.

⑤ Moshe R. Gottlieb, "Reactions of American Jewish Defense Organizations to the Liquidation of the B'nai B'rith in Nazi Germany",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45, no. 3/4 (Summer-Autumn 1983), pp. 287-310.

进行了类似人口普查的活动。该报告较详细地介绍了一般的犹太学生进入大学的情况，并评价了在这 11 年期间所发生的变化，对研究学院和大学招收犹太学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①。

也有学者借助圣约之子会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来分析该组织的领导思想。阿隆加尔在《圣约之子会心中的以色列（1938-1958）》一文中指出，他所研究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些独特特征，其一就是以使命为导向的意识形态——把获得主权作为改善整个社会的使命观念。但是，作者认为，在圣约之子会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中——使命主题几乎不存在于该组织的领导思想之中^②。

国外研究圣约之子会的著作也十分丰富。爱德华·E. 格鲁德的《圣约之子会：一个契约的故事》以时间为主线（1843 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对圣约之子会组织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一系列叙述，并选取了每个年代对圣约之子会组织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进行详细记录，如：参与美国内战、和纳粹势力作斗争、帮助犹太复国等，在肯定圣约之子会取得的各项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它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③。科妮莉亚·威廉的《独立组织：圣约之子会和真姐妹会》研究了圣约之子会作为美国犹太人身份认同的平台，它是如何成长，发展和起主要作用的；以及圣约之子会发展成为庞大的组织之后面临的危机，解体和重生，为此，圣约之子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运动，以适应新的挑战，因为它始终代表美国犹太人的利益^④。黛博拉·摩尔的《圣约之子会和民族领导者的挑战》研究了圣约之子会作为老牌犹太组织的发展历程，同时指出了其在发展过程中与其它犹太组织之间的关系、犹太人群体内部的团结问题，以及圣约之子会为了组织的发展前景所进行的重组和变革等问题^⑤。

3. 关于圣约之子会组织的主要活动方面的研究

阿诺德·达舍夫斯基和艾拉·谢斯金编辑的《美国犹太年鉴（2013）》介绍了圣约之子会提供的各种社会公益项目，并指出这些项目旨在确保犹太人和犹太教利益方面发挥的作用，具体包括：犹太教育、社区志愿服务、捍卫犹太人主权、

^① The B'nai B'rith Survey, "Jewish Student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e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vol. 50 (1948-1949), pp. 767-774.

^② Allon Gal, "Israel in the Mind of B'nai B'rith (1938-1958)",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vol. 77, no. 4 (June 1988), pp. 554-571.

^③ Edward E. Grusd, *B'nai B'rith: The Story of a Covenant*,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96.

^④ Cornelia Wilhelm, *The Independent Orders of B'nai B'rith and True Sisters: Pioneers of a New Jewish Identity, 1843-1914*, Michigan: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⑤ Deborah Dash Moore, *B'nai B'rith and the Challenge of Ethnic Leadership*,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1.

对以色列的援助、改善老年人住房、职业能力培训，以及所有国家的犹太人学习其犹太传统的权利。它作为一个倡导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①。有的著作介绍了圣约之子会的分会组织和附属机构的活动。塞缪尔·S. 科洪的《犹太参考书：圣约之子会手册》结合圣约之子会服务人类利益的使命和好善乐施的传统对其主要分会组织、主要附属机构以及它们的主要活动展开了介绍，特别是它们在保护美国犹太人，打击反犹主义，开展福利工作等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②。罗伯特·爱德华·埃德蒙森的《圣约之子会：一支国际反基督教、亲共产主义的犹太力量》认为圣约之子会公开反对基督教节日，它的附属机构——希勒尔基金会也反对基督教仪式。除此之外，圣约之子会还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参与共产主义活动，犹太人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产阶级的主要预言家卡尔·马克思也是犹太人。片面地得出了圣约之子组织会的思想和行动能够代表全体犹太人的结论^③。本·德沃斯金的《与圣约之子会希勒尔基金会选择大学生的隶属关系或非隶属关系相关的社会因素》一书介绍了圣约之子会附属机构希勒尔基金会创办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价值观念和主要结构。犹太人的传统生活模式对于在西方生活的犹太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而当希勒尔基金会以犹太文化的传统精华补充西方校园知识的缺失时，犹太大学生的生活就会变得丰富起来，其主要目标就是使犹太人的宗教习俗和文化价值更好地融入美国犹太大学生的生活。希勒尔基金会作为犹太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为美国犹太大学生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④。阿尔弗雷德·乔斯佩的《圣约之子会希勒尔基金会》一文介绍了圣约之子会的重要青年分会组织：希勒尔基金会的各项活动计划，指出组织的目标不止是为犹太学生提供教育服务，而且包括引导他们参加宗教活动。同时，组织还为犹太学生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提供帮助和心理疏导^⑤。

有的著作分析了美国犹太人群体与美国政治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哈西亚·R. 迪纳的《美国犹太人（1654-2000）》描述了犹太人如何在17世纪来到美国，并

^① Arnold Dashefsky & Ira Sheskin,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2013*, vol. 113,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4.

^② Samuel S. Cohon, *Jewish Reference Book: B'nai B'rith Manual*, London: Forgotten Books, 2018.

^③ Robert Edward Edmondson, *B'nai B'rith: An International Anti-Christian, Pro-Communist Jewish Power*, New York: John Merrick Church, 1937.

^④ Ben V. Dwoskin, *Soci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Affiliation or Non-affiliation in the B'nai B'rith Hillel Foundation of Selected College Students*, Ann Arbor: ProQuest LLC., 1950.

^⑤ Alfred Jospe, "The B'nai B'rith Hillel Foundations", *Religious Education*, vol. 48, 1953, pp. 236-241.

在一般情况下默默无闻地生活在犹太人社区中，甚至完全隐藏或放弃了他们的犹太人身份，有意识地寻求成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犹太人抓住了西进运动的机遇，在工商业领域取得了许多成就，并且开始涌入城市。而 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新政，也给美国犹太人创造了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反犹主义犹存的问题、犹太传统取舍的问题、大屠杀和身份认同的问题也困扰着美国犹太人^①。霍华德·M. 萨查尔的《美国犹太人的历史》讲述了犹太人在登上美洲大陆后是如何艰难立足的，如何完成文化适应的，如何巩固犹太人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如何处理东欧犹太移民的问题的，如何在美国这片新土地上寻找自己的职业方向、延续自己的慈善事业和文化传统的。面对两次世界大战，他们积极组织战时救济运动，同时，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推动以色列建国。他们在美利坚的土地上，在文化多样性中努力寻求平衡和统一^②。J. J. 戈德堡的《来自美国犹太机构内部的犹太力量》向大家介绍了犹太社区组织中的领导人和他们与华盛顿及以色列官方互动的方式、犹太游说团体及其各个附属机构的运作方式、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自由事业的参与、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等，并对犹太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在美国的来源和作用的进行了全面的审视。除此之外，还涉及到了美国犹太人与大屠杀、国会、媒体、非裔美国人、同性恋社区、好莱坞等问题^③。

弗雷德·A. 拉辛著，张淑清、徐鹤鸣译的《美国政治中的苏联犹太人之争——透视以色列与美国当权派的关系》在探讨苏联犹太人问题时，提到了许多美国犹太组织，其中对圣约之子会（B'nai B'rith）也有所提及，书中指出该组织积极参与美国犹太人事务，其成员更是和阿巴·埃班一起创建了美国主要犹太组织主席团会议^④。

通过上述梳理发现，相比国内，国外学者对圣约之子会有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对于国内来说，只是在一些著作或者文章当中对其有所提及，但是还没有系统深入地探讨。而圣约之子会对于美国犹太组织和美国犹太政策以及以色列等的发展到了重要的作用，值得进行研究，因此，给本文留下了一定的研究空间。

^① Hasia R. Diner, *The Jews of the United States (1654 to 2000)*,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②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America*,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2013.

^③ J. J. Goldberg, *Jewish Power: Inside the American Jewish Establishment*,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1996.

^④ [以]弗雷德·A. 拉辛著：《美国政治中的苏联犹太人之争：透视以色列与美国当权派的关系》，张淑清、徐鹤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

三、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对所收集、整理的文献和资料进行归纳、分析，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和掌握所要研究的问题。同时按研究课题的需要，对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视频等纪录保存下来的资料内容作为分析的对象，进行比较、分析、综合，从中提炼出评述性的说明。比如，从网络上有关圣约之子会的视频资料、图片资料、报纸资料中提炼出重要信息，通过对圣约之子会组织的分会组织和附属机构，以及它们参加的主要活动进行分析，从小的活动中得出组织的总体性质。还可以通过研究圣约之子会的主要特征，来分析美国犹太组织和美国犹太人的特征。

2、比较研究法：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多方面的比较，通过对圣约之子会和其他美国犹太组织的比较研究，还有以色列建国前后圣约之子会开展的主要活动的差异研究，得出它们的共性与不同之处，这样便可以为更好的了解圣约之子会组织和美国犹太人的政治地位提供经验借鉴。在比较的同时，梳理获得的相关资料，对圣约之子会组织各方面的活动展开研究，进行归纳总结，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犹太组织对美国犹太政策的表决权以及其在美国政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小见大，洞察到美国犹太人的政治影响力。通过圣约之子会组织对美国中东政策等的影响力，我们可以瞥见其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分析美国犹太人的政治地位。

四、创新点

第一，选题创新。在对圣约之子会组织的专门研究方面，笔者发现国内相关文章寥寥无几，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总体来说，国内学术界对于美国犹太组织研究的文章较少，国外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则成熟一些。国内的研究情况，给予该课题以广泛的创新空间。笔者计划既从圣约之子会组织的主要活动方面来研究，又从美国政治生活视角方面来发现，使他们相互补充，将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系分析出来，从而让读者更好地了解美国犹太组织的政治影响力和美国犹太人的重要地位。

第二，研究角度新颖。本文的研究对象——圣约之子会组织是于 1843 年在美国诞生的，此后，1948 年以色列建国无疑是对它影响较大的一个历史事件。本文将以时间顺序为主线，同时结合以色列建国前后该组织在结构和政策等方面发生的主要变化，进行比较研究。

第一章 圣约之子会的建立与发展

公元 135 年之后，犹太人开始流散生活，先后辗转寄居在埃及、巴比伦、西欧、东欧等地。作为客民，犹太人努力维系自己的传统文化，与主流社会在经济等方面进行交流互动，但时常遭遇驱逐、诽谤乃至暴力冲击。15、16 世纪以后，东欧成为新的犹太人生活中心，沙皇俄国时期，“反犹主义”浪潮再次掀起，犹太人遭到了驱逐甚至是屠杀。出于形势考虑，很多犹太人外迁到北美大陆，并在这里定居下来。这些犹太人多以男子为主，通常他们到达北美以后，先想办法谋生，等到安稳地定居下来以后，再联络亲友移民过来。19 世纪是犹太人往美国移民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间段移民的规模和数量都明显扩大。随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在美国定居，面对陌生的环境，拥有共同传统的他们渴望团结起来，许多美国犹太组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并发展起来的。

一、圣约之子会的建立

（一）圣约之子会的建立背景

1. 美国犹太人的困难处境

1654 年，首批犹太人抵达北美大陆，他们的队伍仅由 23 人组成。直到 1700 年，北美犹太人的数量才增长至 200 人。而到了 1776 年，增长至 2500 人，到 1820 年增长至 4000 人。19 世纪 20 年代，年轻的犹太人开始从法国和俄国之间的中欧地区大规模往美国移民。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约有 15 万中欧犹太人移民到了美国，规模可谓相当庞大了。^①大多数犹太人生活在大西洋沿岸，在纽约等港口城市建立了犹太人社区。除此之外，罗德岛的纽波特、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以及费城等地也有不少犹太人生活。每个犹太社区都拥有自己的历史，但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因为无论居住在哪里，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以经商为生。他们通常都拥有自己的小商店，出售蜡烛、干货和烈酒等日用品。经营规模更大、更成功的犹太商人还会将木材、谷物、毛皮、糖蜜和烟草等原材料运往欧洲，并进口布料和铁器等制成品出售给美国人。部分最富有的犹太人还曾参与了奴隶贸易，将非洲奴隶带到了美洲，同时也将西印度的朗姆酒和糖蜜带到了北美。一小部分犹太人在具有家族传承性质的小商店里工作，通常是男人和女人、成年人和儿童共同努力谋生。大部分犹太人成为了走街串巷的小商贩，过起了沿街叫卖的生活。

^① Hasia R. Diner, *Jews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9.

兜售是一项孤独、艰苦且非常危险的工作。起初，这些年轻人根本不会说英语，无法正常地与美国当地人交流。他们通常会花费一周的时间，在美国的城镇间穿梭，从一个农舍走到另一个农舍来贩卖物品，时常会遭遇不友好的对待：当地的孩子认为他们是奇怪的人，朝他们扔石头表示驱赶；强盗袭击也是家常便饭，更有几起抢劫案演变成了谋杀案，可能某位年轻的犹太移民最终不是死在家里，而是死在某个偏远地区的一段清冷僻静的道路上——远离他的家人——最后只有死亡地的社区为他举办简易的犹太葬礼。除了人为因素，天气因素也是小贩需要克服的另一难关。因为不管天气变冷还是气温飙升，小贩们都不得不在外面销售商品。走街串巷的他们通常睡在户外，偶尔遇到一位和蔼的农民可能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谷仓过夜，或者是一位特别慷慨的农民可能会在房子里为他们提供一张真正的床，供他们在温暖的炉火前休息。但这种情况只能说是极少数，大部分犹太小贩的生活异常艰辛。

不只是生活问题，宗教矛盾也不容忽视。每到星期五下午，犹太小贩试图在拥有犹太社区的城镇聚集。在那里，他们可能会找到一座犹太会堂或者某个犹太寄宿所，亦或一群志趣相投的犹太同胞。他们可以围坐在一起祈祷、吃饭和聊天。他们可以在其他犹太人的陪伴下庆祝安息日，可以在此短暂地停下手头的工作，寻找安息日的意义。然而，通常情况下，他们无法保证能在每周的第七天不工作、不购物、不旅行、不烧煮。^①犹太小贩所从事的销售工作的性质也无法使他们一直维持安息日的神圣性。而且，很少有寄宿所能够提供犹太食品。犹太教中关于食物的规定使小贩们最为苦恼——犹太人可以吃某些动物的肉，但不能吃除此之外其他动物的肉，他们可食用的肉需要由屠师“索海特”(Shochet)屠宰^②。猪肉是美国人饮食中最常见的肉类，但这对于犹太人来说，是禁止食用的。除此之外，犹太人所食用的肉类必须经过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屠宰切割。犹太人不能同时食用肉类和牛奶，这也是犹太饮食法的一项规定。所以，许多人发现放弃犹太教饮食规定生活起来会更容易。而那些不愿放弃犹太教饮食规定的人往往过着素食主义者的生活。有的小贩们在日记里写道：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些切罗基印第安人称自己遇到的犹太人为“吃鸡蛋的人”。^③

虽然犹太人已经成功地抵达北美并在这里定居生活，但宗教偏见和不容忍却常常伴随着他们，无论他们是“欧洲人”还是已经转变国籍，成为了“美国人”。

^① 黄陵渝：《犹太人的宗教习俗与外在标志》，《世界民族》2004年第3期，第74页。

^② 同上，第76页。

^③ Hasia R. Diner, *Jews in America*, p. 34.

当地的牧师们——尤其是在马萨诸塞州——对犹太人进行强行布道，指责他们是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罪魁祸首，并称他们为撒旦的代理人。在 1669 年出版的一本名为《以色列得救之谜》的书中，波士顿牧师马瑟公然宣称犹太人犯下了杀害耶稣的罪行，他们应该承担“救世主之血”的骂名。北美殖民地的报纸有时也会把犹太人塑造成肮脏和贪婪的形象，例如，在美国大革命期间，《查尔斯顿公报》就声称犹太人与英国人合作赚钱。^①而这些空穴来风的新闻，无疑是基督徒对犹太人的诽谤。

如同在欧洲一样，北美犹太人的权利和自由也受到了种种限制。18 世纪，犹太人不能居住在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或新罕布什尔州。在大多数殖民地和后来独立的一些州内，犹太人不能投票、担任民选职位或担任陪审团成员。在所有他们居住生活的地方，大多数非犹太人都认为犹太人是社会中地位最低的群体。事实上，犹太人与其他早期美国人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刻意融入社会，不想引起美国人对自己的注意，也不想与周围的社会脱节。

这些都促使他们迫切地需要聚集在一起，而犹太会堂和犹太社区则成为了他们团结和联系的纽带。小贩们在美国适应了几年并开发了贸易路线后，他们便会向远在欧洲的亲友们汇款，以便亲友们能加入他们。而且有了亲友的帮助支持，小贩们也方便扩大其生意版图，从而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美国中心地带。比较成功的犹太小贩存了一些钱后，便会在小城镇和中等城市开设一家小店。这些城镇通常有几家犹太人开设的商店，并且几乎所有的商店都贩卖同样的东西，都聚集在市中心地带。犹太商人们在纽约、田纳西州、华盛顿、俄亥俄州等地区的几十个大城市里开设店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城市便形成了完整的犹太社区，里面配有犹太会堂、学校、墓地、慈善团体和娱乐场所等基础设施机构。

圣约之子会组织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起初它就是源于犹太人的例行聚会。1843 年 10 月 13 日，以亨利·琼斯为首的十二个人照例聚集在纽约市埃塞克斯街的辛斯海默咖啡馆，他们决定仿照当时盛行的社团模式来建立一个兄弟会，以帮助那些在美国生活困难的犹太同胞们。^②经过讨论，成员给这个兄弟会取了德语名字“Bundes Bruder”，意思是兄弟联盟；希伯来语名字选择了“B'nai B'rith”，意思是“圣约之子”。之所以选择了“B'nai B'rith”而不是“Bundes Bruder”

^① Hasia R. Diner, *Jews in America*, p. 22.

^②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Improved Order B'nai B'rith”, *The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vol. 2 (September 24, 1900 to September 13, 1901). p. 90.

的希伯来语字面翻译，是因为他们希望德语和希伯来语名字的首字母要一致。^①

圣约之子会成员的第一项具体行动是制定一份保险单，为已故成员的遗孀提供 30 美元的丧葬费，并每周为她们提供 1 美元作为生活津贴。他们的孩子也会得到一笔津贴，而且对于男孩，圣约之子会还会教授他们一门赖以谋生的手艺。圣约之子会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比传统的互助团体或慈善机构更为远大：其创始者希望它能作为整个美国犹太人的思想凝聚和文化交流机构。因为在 19 世纪 40 年代，美国犹太人不仅完全缺乏团结和合作的精神，而且也缺乏对高水平知识的追求。也正是在这种援助犹太同胞和团结犹太移民的思想基础上，圣约之子会在美国迅速发展了起来，成立了许多分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组织，并最终成功地走向了世界各地。

2. 犹太人的慈善救助传统

犹太人素有慈善救济传统。对于犹太人的慈善观念来说，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们的“公义”理念。犹太教认为，公义是上帝的属性。《旧约》中说：“（上帝）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因此，上帝要求世人“要追求至公至义”。^②不仅是对待神要公正，在处理人类关系的时候也要公平公正，对于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不可冷眼旁观，要施以援手，尽可能地帮助他们。

而犹太人的慈善救助思想一经形成，就成为了他们社会生活中的基本信条，纵使出于种种原因犹太人被迫散居世界各地，但他们的公义信仰非但没有改变，而且一代代地传承了下去。圣约之子会组织就是犹太人公义信仰和慈善观念的最佳体现之一，它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团结和帮助那些移民到北美的犹太人。圣约之子会建立和支持著名的美国犹太人防御组织——反诽谤联盟；它的附属机构——希勒基金会构成了大学校园中的国际学生团体网络；它通过其成人犹太教育委员会（AJE）来赞助各种犹太人的学习计划；它的附属机构——圣约之子会青年组织（BBYO）则关注犹太青年的成长问题，并为整个犹太社区服务；除此之外，圣约之子会积极在以色列开展具有教育性质的项目和计划，同时也为一些国家的犹太医院和养老院提供资金，努力为犹太民族的慈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圣约之子会的宗旨和使命

圣约之子会于 1843 年以兄弟会的身份面世，在其刚诞生的时候就硕果累累。

^① <http://www.bnaibrith.org/>[2022-11-27].

^② 徐新：《追求公义——论犹太人的捐赠思想》，《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6 期，第 53 页。

起初，该组织是由德国的犹太移民在美国纽约建立的，其创始人将它慢慢扩大，并把它引入到美国的各个城镇里。四十年后，会员们将该组织输出到国外，这使得圣约之子会成为首个穿越大西洋的美国本土犹太机构。^①圣约之子会是一个综合性组织，该组织在新兴的美国土地上得到了很多蓬勃发展的机会。然而，无论犹太人定居在哪里，都不得不提起美国犹太人，因为他们的开拓性影响已经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②同时，美国犹太人创建的圣约之子会组织及其积极扩展，为犹太人在 20 世纪的广泛活动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圣约之子会最初成立甚至是成立之后的几十年中，其领导人始终关注着两个重要的问题：对美国犹太人的领导和团结美国犹太人的使命。圣约之子会的领导人一直在努力团结其他美国犹太组织，为犹太人在社会竞争激烈的美国寻求一席之地。他们对团结和领导力的追求，反映了该组织对美国社会结构的充分了解和对社会多样性的包容，以及对全世界犹太人集体需求的认知。圣约之子会成功地融合了犹太传统和美国文化，并树立了几项重要的典范。圣约之子会的各项活动对初到美国的犹太人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尽管为了响应其他犹太团体发起的挑战，圣约之子会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其世俗犹太兄弟会的意识形态，但这一调整的过程并没有在其内部引发冲突。相反，圣约之子会通过内部调整发展出一种辩证法，使其介于努力被美国社会所接受与维护自身犹太属性两者之间。该组织还将对集体负责任的主张，与对个人自我实现的要求并置，认为两者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首先，圣约之子会领导美国犹太人的宗旨表现在其对犹太移民问题的态度上。在圣约之子会成立的最初的几年里，其领导层的愿望总是被紧张的移民局势围绕着，他们能做的只有通过提供一些生活资源来团结和帮助孤独的东欧移民，他们认为这些苦苦挣扎的东欧犹太人先不需要得到精神上的提升。因为他们明白，移民只有在物质上得到了充实，才能更好地了解美国社会的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促使基督教文化和犹太教文化相互融合。到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分会组织在世界各地成立，现实的文化融合取代了先前的文化冲突。然而，一些组织成员对新的融合方式提出了看法，认为慈善事业作为犹太传统和美国价值观的崇高表达，应该代表该组织的本质。

此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东欧犹太人向美国大规模移民，圣约之子会组织通过

^① Deborah Dash Moore, *B'nai B'rith and the Challenge of Ethnic Leadership*, p. 9.

^② Edward E. Grusd, *B'nai B'rith: The Story of a Covenant*, p. 60.

了一项新的犹太人社会服务计划，承担了帮助新犹太移民的责任，对团结犹太人的事业表现出了强烈的参与意识。但是，大规模的犹太移民扰乱了圣约之子会组织与美国社会之间的平衡，促使其重新肯定了对美国犹太人团结和领导的目标。于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该组织的活动重心再次回到社会服务领域，但是工作重心部分地转移到了年轻人身上。^①因为与父母相比，年轻人可以更容易地接受新生活和融合新文化。即圣约之子会通过其青年附属机构：希勒尔基金会和圣约之子会青年组织使美国文化和犹太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综合。

其次，圣约之子会团结犹太人的使命表现在其与纳粹势力的对抗上。当美国犹太人通过新闻知晓了骇人听闻的纳粹大屠杀事件时，圣约之子会承担起了团结犹太人对抗共同的纳粹敌人的任务。组织不但通过发起经济援助、抗议活动等方式来反对希特勒的暴行，并且尽力帮助那些处境危险的德国犹太难民移民美国。

最后，圣约之子会团结犹太人的使命表现在其对犹太人生活的关注上。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为了维持以色列乃至全世界犹太人生活的需求，以及调和美国犹太人与其他犹太人之间的差异，圣约之子会组织一直都在积极奋斗。^②圣约之子会的犹太人成人教育计划成功地帮助了初到美国的犹太移民，解决了其面临的文化适应挑战。圣约之子会发起的慈善筹款，也成为连接多方的坚实纽带。

圣约之子会的历史踪迹表明，适应能力、调和能力以及创新能力是维持一个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它为大家展示了实现美国犹太人团结和领导美国犹太人发展这个双重目标的多种方式。虽然圣约之子会经常修改其价值定位、组织结构和目标计划，但它仍坚持最初的双重使命，即统一和领导美国乃至世界的犹太人，在帮助犹太人的基础上，造福全人类。

二、圣约之子会的发展壮大

（一）主要附属机构

在圣约之子会成立后的几十年里，针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组织成立了各种分会机构予以应对。圣约之子会于 1900 年为东欧犹太移民提供语言帮助和“美国化”课程，为他们提供社区住所，同时成立了成人犹太教育委员会，并支持纽约和费城的学校建设。^③随着组织的发展壮大，后来其更名为“国际圣约之子会”（文中仍简称圣约之子会），并建立了反诽谤联盟，致力于帮助犹太人和基督徒

^① Deborah Dash Moore, *B'nai B'rith and the Challenge of Ethnic Leadership*, p. xiv.

^② *Ibid.*

^③ Leo N. Levi,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Jewish Charities, Held at Detroit, Michigan, March, 1902", in *Memorial Volume* (Chicago: Hamburger, n.d.), pp. 31-32.

了解“粗俗的宗教刻板印象是如何煽动偏见的”，以此来打击反犹主义。为了加强对高中生和大学的教育，将他们现在所学知识 with 犹太传统联系起来，“圣约之子会青年组织”被建立起来，包括以后各高校联合建立起来的希勒尔基金会，也承担了犹太教育的任务。同时，圣约之子会积极关注女性问题，成立了圣约之子会妇女会，尽可能地向犹太乃至全世界女性伸出援助之手。

1. 反诽谤联盟

随着圣约之子会在美国的发展，它也越来越关注对美国犹太人的保护，这反映了该组织领导人的基本观念，即把自己定义为一个保护犹太人权利的组织，同时能够成为团结和领导犹太社区的潜在力量。19 世纪 90 年代，美国犹太人的处境并不尽人意，他们常常会被禁止进入酒店和度假村。社会对犹太人的仇恨也达到了一定高度，电影《快车》在全国范围内传播了犹太人的丑恶形象，他们被描绘成守财奴、纵火犯、骗子，最受欢迎的电影主题是“犹太人银行家”和“犹太小贩”。反犹太主义言论的盛行和犹太负面刻板印象的增加使犹太人感到沮丧，他们迫切希望这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希望能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机构来回应部分基督教分子对犹太人的诽谤和打击，这为圣约之子会成立反诽谤联盟附属机构做出了铺垫。

而后来发生的几次重大反犹事件更是催化了反诽谤联盟的诞生。第一起事件是发生在 1894 年的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案，德雷福斯是一名法国犹太裔军官，他被指控向德国泄露法国军方的重要情报，并被处以叛国罪流放。第二起事件是俄国政府逮捕了犹太工人孟德尔·贝利斯，他被指控谋杀了一名 12 岁的基督教男孩，目的是将孩子的血液用于宗教活动。第三起事件发生在 1913 年的 4 月 29 日，美国警方逮捕了一位名叫利奥·弗兰克的年轻人，罪名是他谋杀了一名 14 岁的美国女孩玛丽·帕根。在弗兰克接受庭审期间，关于犹太人的不实言论四处传播；法院外，人群高呼“绞死犹太人”。

事情已经演化为无论犹太人做了什么事情，都将是非常不幸的。因为无论做了什么，都是非正义的、错误的，任何正义的行动都应该来自非犹太人。^①“弗兰克案”间接推动了反诽谤联盟的成立，因为在圣约之子会宣布成立反诽谤联盟，并将其作为一个致力于捍卫所有犹太人权利的犹太机构时，曾提及过弗兰克案。圣约之子会行政会议委员会指出，在案件当中，反犹主义者“绞尽脑汁地想引人注目”，甚至试图影响法院的判决，只因诉讼的一方弗兰克恰好是犹太人。这些

^① Leonard Dinnerstein, *The Leo Frank Cas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74.

举动无疑激怒了美国甚至是全世界的犹太人，他们认为是时候站出来发声，或者做出反击了，于是反诽谤联盟机构应运而生。

该联盟的创始人是西格蒙德·利文斯顿（Sigmund Livingston），他是圣约之子会组织的一名活跃分子，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担任反诽谤联盟的主席。在早些时候的圣约之子会演讲中，利文斯顿就阐述过成立一个犹太人宣传委员会的概念，并简单地描绘了其相关职能，该委员会后来成为了圣约之子会反诽谤联盟的前身。^①再后来，布鲁克林区的梅耶·施泰因布林（Meyer Steinbrink）接替了利文斯顿的职务，他是纽约州最高法院的法官。为了纪念即将卸任的利文斯顿主席，梅耶设立了十项研究基金，每年为研究群体偏见的优秀论文作者提供奖励。但实际上，这个秘密组织背后的权力向导是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亨利·蒙斯基（Henry Monsky）。蒙斯基是一名律师，自1938年以来一直担任圣约之子会的重要负责人。他的社交范围十分广泛，包含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

反诽谤联盟的全名是“圣约之子会反诽谤联盟”，它是圣约之子会组织的主要附属机构之一，于1913年在美国的芝加哥成立。反诽谤联盟在芝加哥的总部会员数目众多，并且在美国的主要大城市里设立了15个分支机构。反诽谤联盟主要通过私人捐赠、预算筹款等方式来获得其开展各项活动的资金，比如说圣约之子会组织提供的金钱援助。根据相关资料记载，1945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和反诽谤联盟获得了4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1946年，仅反诽谤联盟自己就筹集到了400万美元。1947年，它的目标更是设定到了500万美元。^②反诽谤联盟也积极利用筹集的资金开展打击反犹主义活动，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效。

作为圣约之子会的第一个附属组织，反诽谤联盟的主要目标是“改善”法律，以消除偏见，通过法律让污蔑犹太人者“畏惧”。例如，反诽谤联盟就曾提出过一项法律，主张将任何贬损犹太人的行为都定为刑事犯罪，虽然有其不合理之处，但却是犹太人抗击反犹主义的积极行动。反诽谤联盟的宗旨是打击反犹言论和行为，它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一起，积极赞助各种对抗固化犹太人形象的电影、书籍和会议，让人们认识到宗教不容忍是非常不合理的。而且，反犹主义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德国甚至是全世界的犹太人，如何妥善处理这一问题，对反诽谤联盟甚至是全体犹太人来说，都任重而道远。

^① Thomas David Mantel, "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 of B'nai B'rith", *Harvard University Honors Thesis*, 1950, p. 15.

^② E. E. Aubrey, "Questions and Answers concerning the Jew by Anti-Defamation League of B'nai B'rith",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vol. 23, no. 4 (October 1943), p. 297.

2. 希勒尔基金会

作为一个致力于造福犹太人的组织，犹太青年人的健康成长也是圣约之子会关注的焦点之一。1925年成立的圣约之子会希勒尔基金会，致力于在犹太学生最容易受影响的青年时期，为他们营造一种犹太文化氛围，比如社会、教育、娱乐、宗教和社区氛围，帮助他们认清自己的犹太身份。^①它并不试图与其他组织竞争或取代其他组织，而是始终与已经存在的组织进行协调、补充和合作，帮助其他组织完成各项活动。希勒尔基金会与各个大学现有的任何其他学生组织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存在的。它就像主管运作它的圣约之子会一样，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统派、保守派或改革派，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非犹太复国论者或反犹太复国论者。在希勒尔基金会中，每一种宗教思想和愿望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希勒尔基金会还试图扮演一种引导的角色——因为该组织的领导人足够年轻，能够理解青年人的想法，同时又足够明智和精干，能够指导这些企图脱离家庭关系和学校束缚的青年人的生活。希勒尔基金会试图用有益健康的活动来充实这些学生的生活，组织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他们尽可能地满足青少年的特殊心理和特殊状态，特别是围绕大家都比较敏感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话题展开。希勒尔基金会不仅在人性上是包容各方的，它在组织上也是包容各方的，因为学生们与其犹太长辈相比，更容易选择对外宽容。

希勒尔基金会会有一个学生委员会，一直致力于促进有组织的团体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些团体包括兄弟会、女生联谊会和“独立人士”——非慈善团体等。它还一直致力于安排兄弟会之间、姐妹会之间、非犹太兄弟会之间以及非犹太姐妹会之间的晚餐交换。^②了解不同民族的饮食习惯能促进相互间的理解，进而促进更友好的关系。希勒尔基金会的学生委员会欢迎新生步入大学，帮助他们找到宿舍，并在必要时帮助他们找工作。

每个希勒尔基金会都有义务为学生提供犹太课程，例如，位于纽约的布鲁克林学院为学生们安排了以下课程：犹太社会的形成、从古代到中世纪的历史、当代犹太哲学、犹太青年和战后问题、犹太经典读物、犹太节日和民俗、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和社会趋势、初级和高级意第绪语等。学院还开设了希伯来语系，试图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课程资源和学习环境。^③每个希勒尔基金会的信息系统对犹

^① Alfred Jospe, "The B'nai B'rith Hillel Foundations", *Religious Education*, vol. 48, 1953, p. 236.

^② Louis L. Mann, "B'nai B'rith Hillel Foundations", pp. 21-22.

^③ Rabbi Harry Essrig, "Cultural Program of Hillel Foundation", *Jewish Education*, vol. 18, no. 2,

太学生都会提供特别的帮助。为此，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遭受质疑——质疑它垄断了犹太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但实际上，希勒基金会并没有在校园里隔离犹太学生，而是赋予了美国大学中的犹太学生不同的文化选择权，促进了文化融合。

希勒尔基金会在大学设立了奖项，向所有兄弟会开放，不分宗教派别。由于希勒基金会存在，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教派间的服务，这也有助于促进理解和传播善意。在希勒尔基金会中，社会服务也有多种表现形式。该委员会曾协助一所大学为盲人制作盲文书籍；在另一家医院，委员会看望生病的学生，为他们送上鲜花并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委员会还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贷款基金，并帮助那些通过兼职完成大学学业的人找到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勒尔基金会通过其设立的外国学生服务项目，资助了数百名来自欧洲的拥有远大前程的犹太学生，挽救了许多年轻学者稍纵即逝的生命。

3. 圣约之子会青年组织

谈到犹太青年组织，除了希勒尔基金会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组织：圣约之子会青年组织，它的全称是 B'nai B'rith Youth Organization，简称 BBYO，其前身是阿扎尔组织（AZA）。阿扎尔原本是一个犹太社交体育俱乐部，像美国各个城市的青少年男孩创建的其他犹太俱乐部一样，该俱乐部将年轻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以促进交流。这些俱乐部往往是居住邻近的犹太同龄人团体间的产物，目标是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寻找社交的机会。

1924 年，年轻的奥马哈律师萨姆·贝伯（Sam Beber）加入了阿扎尔。但贝伯并没有单纯地享受俱乐部带来的体育或社交内容，而是将俱乐部视为一个打开全国性的犹太青年组织的大门，并打算为犹太青年人提供一些有吸引力的东西：充满仪式感的入会流程、全国性的篮球比赛、辩论和演讲等。^①而这些社交和体育俱乐部中，不仅有犹太青年的存在，还有犹太领导人的加入。因此，贝伯赋予了阿扎尔俱乐部的首字母 AZA 以特殊意义：A 代表爱（Ahava），Z 代表正义（Zedaka），A 代表团结（Achdut）。^②本着这样的发展理念，阿扎尔组织在贝伯的带领下，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路线，并取得了成功。

于是，贝伯的朋友也积极响应他的号召，在美国其他地区成立了阿扎尔分会，进一步壮大了组织。随后，阿扎尔迅速扩张，在整个中西部城市设立了分会。到 1924 年底，贝伯又在中西部建立了三个阿扎尔分会，并获得了第二区和第四区

1947, pp. 36-37.

^① Edward E. Grusd, *B'nai B'rith: The Story of a Covenant*, p. 180.

^② Deborah Dash Moore, *B'nai B'rith and the Challenge of Ethnic Leadership*, p. 151.

的授权，成立了更多的组织。在 20 世纪 30 年代，阿扎尔旨在鼓励十几岁的男孩创造自己的生活空间，如积极参加辩论、体育比赛、社交和犹太文化学习等活动。^①这些活动开阔了犹太青少年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同时也赋予了他们除课堂学习之外的各种能力。

贝伯卸任阿扎尔主席职位后，克鲁茨尼克接替他继续领导阿扎尔。在克鲁茨尼克的指导下，阿扎尔的最高咨询委员会于 1942 年投票决定结束该组织的运行。阿扎尔随后加入了圣约之子会青年组织，圣约之子会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将阿扎尔作为其辅助成员组织，负责监督圣约之子会青年组织的委员会，监督的对象包括成年男性、女性和青年群体。时任圣约之子会委员会主席的蒙斯基鼓励了这一转变，做出了对青年组织工作予以支持的承诺。当时已经担任希勒尔基金会主席的萨哈尔（Sachar），也成为了圣约之子会青年组织的主席。在那两年的时间里，希勒尔基金会和阿扎尔组织的关系密切，但蒙斯基主席的离世和萨哈尔主席的职务调动切断了这种联系。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尽管每个组织的发展是在平行的轨道上各自进行的，但是它们都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圣约之子会青年组织以其早期校友为荣，并有意识地从不断壮大的校友队伍中培养未来的犹太领袖。二战后的“婴儿潮”也为圣约之子会青年组织培养了许多新成员，特别是它的不分宗派的组织方法有助于其广泛地吸引新成员。在其领导人贝尔的指导下，青年组织发展了各种暑期培训班，旨在为其母组织圣约之子会培养知识渊博的犹太领导人。这些做法反映了圣约之子会青年组织对领导力培训的日益关注，以及将青年运动与其母组织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的愿望。以后的圣约之子会领导人，如菲利普·克鲁茨尼克（Philip Klutznick）和莱博尔·卡茨（Label Katz），他们都是阿扎尔组织的老成员，都十分赞赏圣约之子会青年组织在培养具有奉献精神的犹太个人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圣约之子会青年组织的发展也表明，圣约之子会始终把犹太青年事业放在首位。

圣约之子会青年组织从成立之初就与当地的圣约之子会分会的领导层联系在一起。随着越来越多的圣约之子会青年组织成员就任于母组织——圣约之子会，年轻人参与圣约之子会青年组织和他们成人后加入圣约之子会这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越来越明显。^②此外，对领导力培训的重视确保了许多前圣约之子会青年组织成员不仅会加入圣约之子会的队伍，而且最终会领导队伍。圣约之子会在

^① Sam Beber, “The Birth of AZA As I Remember It”, *The Shofar*, (May 1974), p. 10.

^② Rabbi Harry Kaplan, “The Hillel Foundation as Educator”, *Religious Education*, vol. 25 (May 2006), p. 72.

其组织大会上授予圣约之子会青年组织成员代表身份时正式承认了这些联系,圣约之子会青年组织的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反映了其母组织的关怀。在 50 年的时间里,圣约之子会青年组织走过了其母组织花了 100 多年才走完的整个发展历程。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两个组织大踏步地携手前进,共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点,为犹太青年的思想进步作出了更加积极完善的努力。

4. 圣约之子会妇女会

在 1843 年圣约之子会组织成立之初就定义自己为成年男性公民团体,把女性成员排除在外。甚至在组织成立后的几十年里,许多消息来源都表明,妇女不是该组织各项活动所欢迎的客人。在 1890 年的全国大会之前,圣约之子会曾正式把接纳女性作为组织成员的提议交付给了各个成员,但被果断地否决了。基于美国犹太妇女无法加入圣约之子会组织的情况,于是她们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组织——1893 年全国犹太妇女委员会(NCJW)成立。该组织将各领域内妇女所能承担的各种宗教、慈善和教育活动等作为其明确的行动目标。^①像圣约之子会一样,它旨在团结不同宗教和社会背景的犹太妇女,但实际上其所有的成员都是具有德国血统的中产阶级妇女。

随后,在其充满干劲的通讯秘书赛迪的领导下,全国犹太妇女委员会为自己设定了新的奋斗目标——帮助欧洲犹太移民妇女,即从欧洲移民到美洲的犹太妇女在纽约埃利斯岛下船的那一刻起,组织就为她们提供相关的帮助,包括社会生活以及文化适应等各个方面。围绕着这个目标,组织的各项活动一直以它的女性移民行动计划为基准展开。由此可见,犹太妇女委员会对欧洲犹太移民妇女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其实美国犹太妇女经常可以随丈夫参加各式各样的社交活动,只有极少的仅能由男性成员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女性才被排除在外。圣约之子会也曾推出过很多活动供女性参加,比如在图书馆举行的讲座活动,以及最重要的圣约之子会庆典,也为女性提供了参与的机会。一位叫科勒的犹太报纸编辑曾指出:他看到犹太妇女扮演着“未来胜利的弥赛亚”的角色,并强调了她们作为犹太教女先知和女英雄的传统角色,呼吁她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将重心局限于家庭领域。^②由此可见,美国犹太女性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

此后,圣约之子会在急于解决内部问题时,把目光投向了女性,成员们也开

^① Cornelia Wilhelm, *The Independent Orders of B'nai B'rith and True Sisters: Pioneers of a New Jewish Identity, 1843-1914*, p. 184.

^② Kaufmann Kohler, "Der Beruf des Weibes", *Jewish Times*, May 21, 1875, p. 190.

始支持接纳女性加入组织的想法。当时的一位作家引用了《托拉》中的观点，并指出“男人和女人只是一种肉体上的区别”，并敦促“这个组织，即圣约之子会，不能对接纳女性成员持严重的反对意见，因为男人固有女人所不具备的优点，同时也有很多的女人比男人更具有男子气概，在天性和行为上更能体现出英雄主义特征。”当然，同时代的另一位作家希望将入会特权限制在已婚女性身上，并希望“促使许多年轻女士加快结婚的速度，从而减轻更多焦虑的男性的痛苦”。^①这反映出当时的美国犹太群体对犹太女性持有的两种态度，一种认为应积极接纳女性入会，因为她们具备男性所缺乏的优势；另一种虽然接纳女性入会，但仅限于已婚女性，可见其仍然把女性当做男性的附属品。无论如何，这对女性解放层面来说，已经是一种进步，同时也为圣约之子会妇女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1990年，拥有147年历史的犹太男子兄弟会组织——国际圣约之子会投票决定接纳女性为正式成员。虽然自1971年以来，圣约之子会的很多分会都接受了男性和女性成员，但是女性成员需向其附属团体妇女会缴纳会费，仍然不被视为国际圣约之子会组织的正式成员。如今，这一情况终于得到了改善。^②根据新计划，圣约之子会妇女会将继续作为一个拥有自己议程的全妇女成员自治团体，这意味着女性可以成为这两个团体组织中的一个或同时成为两个团体组织的成员。

圣约之子会的女性成员约占其总成员的四分之一，该组织50万的成员中约有12万人是女性。圣约之子会妇女会成员认为她们的活动应该在母组织圣约之子会的允许范围内，以女性的生活为中心，它还曾宣称道，如果母组织不允许她们保持自治，它就将从母组织中分裂出去。妇女会的主席海拉·S. 利普斯基(Hyla S. Lipsky)表示，她认为该组织“应该继续作为一个专门的机构，为妇女们宣传堕胎权和儿童保育立法等问题，帮助妇女平衡家庭和工作等方面的需求。”^③在圣约之子会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妇女会作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慈善救助、儿童教育、筹集资金等方面有着优异的表现。同时作为一个妇女成员自治机构，它也为其女性成员争取到了更多的机会和权利。

圣约之子会的反诽谤联盟、希勒尔基金会、青年组织和妇女会等附属机构在美国犹太人甚至全世界犹太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组织模式和群体空间。而圣约之子会妇女会作为女性为主的组织，折射出

^① Jacob Riis,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New York: Hill & Wang, 1957, pp. 91-92.

^② Cmk, "B'nai B'rith International Admits Women", p. 9.

^③ Ibid.

来的不止是女性登上社会舞台参与社会活动，还有女性解放问题。总体来说，圣约之子会成立了一众附属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上文提到的这四个，这些附属机构是圣约之子会组织思想和精神外延的体现，它们在国际圣约之子会的带领下形成“伞形”组织结构，逐步渗透到全体犹太人的政治、教育、社会生活当中，带领着犹太人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二）主要分会组织

1. 德国分会

19 世纪 70 年代末，有组织的反犹主义开始在德国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德国犹太历史学家伊斯玛·舍尔施（Ismar Schorsch）曾这样写道：“许多犹太人对这种中世纪仇恨（反犹主义）复兴的反应暴露了他们的心理焦虑和希望幻灭，最终被德国同化却得不到接纳和认可的他们是最委屈的人。”^①德国犹太人急需找到一块心理归属地，德国的第一家圣约之子会分会便是在这种环境下于柏林应运而生的。为当地的犹太人提供社区服务和帮助他们对抗社会孤立，是德国分会所做的最早的努力之一。而圣约之子会的兄弟会结构、人道主义宗旨等先进思想也吸引了学识渊博且富裕的德国犹太人。

德国的圣约之子会强调，“我们会在慈善事业方面与当地的社区和犹太组织合作，但反对政治行动，以免会被指责为世界犹太人的利益服务，而我们对这一指控特别敏感。”^②历史学家犹大·莱因哈兹（Jehuda Reinharz）指出：“尽管圣约之子会在德国的形成背后有反犹太主义的推动，但它的计划并不仅限于保护犹太人。相反，该组织致力于“团结以色列人，以促进人类最崇高和最理想的利益。”^③实际上，德国分会制定了一项三重计划，包括道德教育、社会服务和人道主义行动，以及通过各种努力，使犹太人实现真正的兄弟情谊和团结一致。

到了 1885 年，圣约之子会在除德国柏林以外的其他各地纷纷建立分会，因此组织在德国建立了圣约之子会德国地区大分会，并选举了大分会主席。其中 1898 年至 1924 年担任主席的是伯索尔德·泰恩多弗（Berthold Timendorfer），在他的领导下，圣约之子会德国分会确立了自己作为德国重要机构的地位，它取得的各项成就吸引了犹太社区的许多知名人士参与其建设。

与美国早期的圣约之子会一样，德国分会所避免了所有具有争议性的政治问

^① Ismar Schorsch, *Jewish Reactions to German Anti-Semit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54-55.

^② Jehuda Reinharz, *Fatherland or Promised Land: The Dilemma of the German Jew*,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5, p. 28.

^③ *Ibid.*

题和宗教问题，力求将持有不同观点的犹太人统一起来。组织还在慈善领域进行了创新，用现代慈善形式取代了传统慈善形式。它的各项活动促进了德国犹太人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将德国犹太人与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同胞联系起来，从侧面促进了美国犹太人对不同国家的犹太人特征的深入了解。而圣约之子会在德国的广泛吸引力标志着该组织作为国际兄弟会，开始影响世界并将在未来取得巨大成功的。德裔犹太人的聚集行为有一部分原因是与异教徒（基督教）组织的针对犹太人的骚乱有关，圣约之子会的扩张从侧面反映了反犹主义问题的不断涌现，针对这一问题，该组织将继续在国外发展，以达到团结和保护犹太人的目的。到了19世纪90年代，该组织在罗马尼亚、埃及、巴勒斯坦和奥地利都设置了圣约之子会分会，标志着圣约之子会影响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2. 维也纳分会

1895年，圣约之子会维也纳分会在欧洲大陆的奥地利悄然兴起。而维也纳分会的建立，部分原因是当地犹太人觉得彼此间需要共同保护和相互鼓励，这侧面反映出了圣约之子会在犹太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表明了它并不单单是一个沉闷的犹太组织，它也是犹太人的心灵寄托所。维也纳分会吸引了一些当地最著名的犹太人士，他们正在积极寻求一个可以让他们感到宾至如归的场所，并免受欧洲社会生活中日益刺耳的反犹主义呼声的纷扰。

在维也纳分会成立的两年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加入了圣约之子会。“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被社会所排斥的人”，弗洛伊德后来回忆道，“在这种孤独中，我唤醒了内心深处对与一群精挑细选的高尚男人成为好兄弟的渴望，尽管我有大胆的意见，但是他们仍会以友好的方式接受我。”^①事实证明，弗洛伊德的加入是十分明智的选择，他给组织带来了精神分析学知识，而组织给予了他展示知识的平台。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圣约之子会的意义超越了心灵慰藉”，历史学家丹尼斯·克莱因（Dennis Klein）写道：“他将他目前的精神分析成果带到了兄弟会，这是他对人道主义理想承诺的最直观的表达。”^②圣约之子会兄弟会欢迎弗洛伊德的“大胆意见”，在他加入分会不到两个月后，弗洛伊德做了两场关于解梦工作成果的讲座，这些讲座标志着他最早努力传达他对于梦的新观点所做的努力。

^① Sigmund Freud,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ed. Ernst L. Freud, trans. Tania and James Stern, London: Hogarth, 1961, p. 368.

^② Dennis B. Klein, “Sectarianism and Universalism in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unpublished article, pp. 12, 14.

在此之前，弗洛伊德只与他最亲密的犹太朋友兼医生——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和另一个犹太志愿社团分享过这些观点。由于圣约之子会的热情回应和积极鼓励，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派成立前的几年里，根据他对精神分析的研究，向会友们做了多达八场讲座。因此，圣约之子会为“弗洛伊德的思想萌芽最富有成效的五年期间（1897-1902）提供了重要的知识论坛”^①。

正如精神分析学之父在后来给分会写的一封信中讲道：“在欧洲，没有人愿意听我说话，包括我在维也纳也没有学生的时候，是你（圣约之子会维也纳分会）对我表示同情，你是我的第一个听众。”^②圣约之子会与弗洛伊德的关系不仅局限于为他提供听众，克莱因认为，“弗洛伊德特意选择犹太社会来传播他的发现，这表明犹太人在他发展精神分析学派中占据核心地位。”^③从这个意义上说，圣约之子会维也纳分会是精神分析运动的先驱。展开说来，弗洛伊德与维也纳分会的关系强调了圣约之子会组织的普适性特征。弗洛伊德重视“社会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理想的实现，以及……对他的犹太人血统和身份的同样大方的承认”^④，这正是他在与圣约之子会的交往中所体验到的。弗洛伊德与其他圣约之子会成员分享了这样一种感觉，即他认为犹太人有义务“在当前的道德堕落时期保持人类的崇高理想”^⑤。

弗洛伊德还在组织的会议上向成员们分享了他身为犹太人的自豪感和改善人类生活的决心。他积极致力于在维也纳扩大圣约之子会，并为该分会招募新成员，在1903年协助组织建立了第二个维也纳分会。他把几个关系亲密的朋友和工作支持者都带到了圣约之子会组织，让他们在第二个维也纳分会担任文化委员会的主席。弗洛伊德后来在分会中负责监督图书馆的维护、安排讲座和辩论，并积极鼓励图书出版。

弗洛伊德为促进圣约之子会发展所做的巨大努力表明，他致力于实现其人道主义道德目标的愿景，以及他对犹太情谊和群体团结的深刻认识。正如克莱因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圣约之子会不仅是无法容忍的反犹太主义的避难所，而且它还要鼓励犹太人自由平等地进行集体斗争，帮助其成员重新与陌生的环境建立联系。它与知识分子论坛有所不同，它加强了其成员对犹太道德领导力的信念。”

^① Dennis B. Klein, "Sectarianism and Universalism in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 10.

^② Sigmund Freud,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p. 368.

^③ Dennis B. Klein, "Sectarianism and Universalism in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 12.

^④ Sigmund Freud,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p. 368.

^⑤ Dennis B. Klein, "Sectarianism and Universalism in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 11.

^①即使弗洛伊德后来因自身原因不再积极参与分会事务，但圣约之子会带给弗洛伊德的那种让所有犹太人都受益的使命感，继续激励着他的工作。同样，尽管德国和奥地利的政治自由正在遭受着法西斯主义的侵蚀，但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圣约之子会分会仍然在履行着其对于犹太人的各项承诺，并积极践行着保护犹太人的各项义务。

3. 耶路撒冷分会

1888年，圣约之子会在巴勒斯坦创立了耶路撒冷分会，后来它成为以色列国的第一个公共希伯来语组织。“现代希伯来语之父”以利以谢·本·耶胡达（Eliezer Ben-Yehuda）是它的第一任秘书，该组织也成为传播希伯来口语的中心。^②除了耶路撒冷分会，还有另外两个巴勒斯坦分会，它们通过建立公共图书馆等途径来促进文化传播工作。事实上，组织的海外分会的文化成效已经超过了它们的美国同行。

而位于耶路撒冷的圣约之子会世界中心也是国际圣约之子会在以色列的活动中心，该中心是联系以色列与世界各地的圣约之子会成员和支持者之间的关键纽带。在推进其使命的同时，世界中心通过与以色列民选代表、政府官员和驻以色列的外交使团的接触，促进国际圣约之子会的公共事务进程；通过深入了解国际形势和潜在危险，进一步打击反犹太主义；通过设定教育计划、奖项、研讨会，报告以色列的发展情况和主要发展趋势，为加强以色列与侨民的关系做出贡献；同时开展旨在巩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主权的计划；与以色列当地的学术中心和民间组织合作，积极开展各种学习项目；通过接待来自国外的艺术家、专家和名人来提升以色列的形象等等。

圣约之子会耶路撒冷分会自1888年成立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大约70个小分会，耶路撒冷分会将这些小分会组织成了区域委员会。每个分会都会详细地计划自己的活动，其中的一些活动包括：帮助学校、幼儿园、医院等机构的盲人和新移民；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和衣服；为服完兵役并渴望上大学的士兵提供住房；为贫困家庭的男孩和女孩组织宗教仪式或成人礼庆祝活动；协助特殊奖学金计划和特殊教育机构等。一些分会还设有厨房，每天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多达数百顿的饭菜。在海法，圣约之子会组织赞助成立了一个“父母之家”，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住房。^③

^① Dennis B. Klein, "Sectarianism and Universalism in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p. 12, 14.

^② Deborah Dash Moore, *B'nai B'rith and the Challenge of Ethnic Leadership*, p. 42.

^③ [http://www.bnaibrith.org/\[2022-11-27\]](http://www.bnaibrith.org/[2022-11-27]).

耶路撒冷分会的建立与发展,深刻地反映了圣约之子会组织的乐善好施思想和人道主义理念,同时耶路撒冷分会积极传播希伯来语言和犹太传统文化的努力,也为后来的巴勒斯坦发展甚至以色列建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影响。

如果说 19 世纪末圣约之子会众多分会的建立是归因于当时的反犹主义思潮,犹太人加入组织是为了寻求一个避难所,他们渴望“相互认识、交往和发展兄弟情谊”,那么后来随着组织的不断发展,犹太人的积极入会则表达了他们对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美好愿景,他们认为犹太人可以作为“社会的良心”发挥特殊作用,通过文化活动或科学研究传播他们的人道主义理想。肩负着这样的理念和使命感,国际圣约之子会在世界大大小小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数以百计的分会,它也坚信组织会用某种方式使人类生活变得更美好。

第二章 圣约之子会的主要活动

圣约之子会组织自 1843 年成立之初就为自己定下了团结和维护犹太人的使命，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层出不穷的反犹主义事件，圣约之子会创建了它的第一个重要附属机构——反诽谤联盟，对各种反犹言行进行反击。在二战前后，圣约之子会迅速向自己的同胞伸出了人道主义援助之手。与此同时，圣约之子会和大部分犹太组织一样，也认识到了建立一个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的必要性，因此它积极参与到了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之中，企图干预英国对巴勒斯坦的统治政策，并代表犹太人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发声。

除了积极维护犹太人的权益，圣约之子会还十分关心犹太人的教育和生活。它在世界犹太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美国和以色列积极开展学校教育，增设图书馆，引导犹太人学习犹太传统和新知识。对于生活不便的老年人和孤儿群体，圣约之子会也给予特殊关怀。当然组织也没有忽视对来美犹太移民，特别是开化程度较低的东欧犹太移民的教育，为他们开办了就业局和职业培训学校，帮助他们尽快地适应新环境。

一、保卫犹太人的权利

（一）打击反犹主义

社会学家阿诺德·罗斯（Arnold Rose）认为，美国反犹太主义浪潮的掀起与美国人对犹太人占据城市支配地位的不满密切相关。19 世纪末，美国平民党的反犹主义政策将犹太人塑造成资本主义和城市主义的象征，但是这些概念本身就过于抽象，无法使犹太人成为令美国人满意的仇恨对象。20 世纪初，事态进一步恶化，美国平民党运动的衰落反而激起了反犹太主义浪潮，失意的平民党积极地寻求外部因素来解释他们在民众选举中失败的原因，美国犹太人无疑成为了这个替罪羊。而且在当时，由一个个小镇组成的以农耕生产为主的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孕育反犹主义思潮的国家。

历史学家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就曾指出过，美国群众中，一些平民党人士、东部的贵族知识分子以及生活在城市的穷苦阶层，反犹太主义情绪最为强烈。“然而，这三个群体却是……相隔遥远而且互相容不下的关系，属于美国社会中的极端。半个世纪以来，这种模式一直存在，且从未改变。”^①其次，

^① John Higham, *Send These to Me: Jews and Other Immigrants in Urban America*, New York: Atheneum, 1975, p. 129.

对美国反犹主义思潮兴起的解释还必须与反犹太教运动在国际层面上的兴衰关联起来。随着美国犹太人开始抗议俄国的犹太大屠杀、德国反犹派政党的建立以及美国的移民限制运动,美国国内对犹太人数量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被激发了起来。海厄姆认为,“对反犹主义的解读必须以同时期西方文明的总体发展为中心,这些发展几乎同时伴随着在大西洋两岸反复煽动或打击反犹主义。”^①在反犹主义盛行的每一个时期,经济萧条都是西方国家社会混乱的一个重要因素。1873年至1876年的经济萧条引发了严重的阶级冲突和社会动荡,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矛盾再次出现,并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这些危机时期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运动,人民将“国内的不满情绪转化为煽动打击外国移民”。然而,海厄姆指出,美国的反犹主义较之欧洲已经算是温和的了,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拥有更宽容的传统”,而且是因为“该国存在各种各样的种族目标”,不仅仅局限于犹太人。^②

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圣约之子会越来越担心美国平民党所宣扬的有关意识形态层面的反犹主义思潮。虽然平民党与美国东海岸较远的地理距离基本减弱了美国波士顿上层贵族接受其反犹主义思潮的可能性,而且其主要的中产阶级成员也基本上没有受到当地生活窘迫的劳动人员的暴力反犹事件的影响,但是平民党的言论却成功地传到了美国民众的耳朵里,对犹太人所持有的丑陋的刻板印象也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美国大众文化的爆炸式流行,廉价读物、低俗报刊和快餐电影在全国迅速传播了犹太人的丑恶形象。他们被描绘成守财奴、纵火犯、骗子,最受欢迎的是“犹太银行家”和“犹太小贩”主题。^③但是,大部分犹太人只能对日益激烈的反犹主义言论和犹太人的负面形象感到沮丧,因为他们不确定这些问题是否可以得到改善。

许多美国犹太人并没有被不断变化的环境氛围所恐吓,而是选择继续相信美国社会的基本正义,转而采取自卫的手段。但是那些在美国寻找到了无限经济机遇,且一生中从未经历过有组织的迫害的犹太人,对美国社会尤反常态的反犹行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畏惧感。他们能深刻地认识到,那些反犹主义作品用文字或图片塑造犹太人丑恶形象的力量不容忽视——反犹主义的陈腐观念正在严重威胁着美国犹太人的社会地位。

与此同时,圣约之子会的一项保护犹太人的发展计划通过它独特的洞察视

^① John Higham, *Send These to Me: Jews and Other Immigrants in Urban America*, pp. 129-130.

^② *Ibid.*

^③ Thomas David Mantel, “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 of B’nai B’rith”, p. 15.

角，指出了其对美国犹太人社会地位的基本看法，以及在反犹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各犹太教团脱离美国犹太社区将会面临的危险情况。西格蒙德·利文斯顿（Sigmund Livingston）是一名出生于德国的犹太律师，他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长大。作为圣约之子会的重要成员之一，他简要阐述了在美国需要为犹太人辩护的理由，同时表达了圣约之子会统一和领导美国犹太人的美好愿望，以及如何帮助他们度过当下的反犹主义难关。

作为1901年圣约之子会活跃成员的利文斯顿，也是该组织第六区的主席，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位名叫尤利乌斯·迈耶尔（Julius Meyer）的优秀法官作为他“打击反犹主义事件”的盟友。在1908年对第六区主席所做的报告中，迈耶尔指出：“公众对犹太人的看法已经跌到了低谷”，他提议“成立一个新的常设委员会，其职责是确保在任何地方，犹太人的事业都能得到恰当的支持，一提到犹太人，人们出于道义上的责任，同样要维护他们”。^①

在早些时候的圣约之子会大会演讲中，利文斯顿也概述了一个拥有这样的职能的宣传委员会——该委员会后来成为了圣约之子会反诽谤联盟的前身。利文斯顿从“对犹太人的尊重是美国公众不能忽视的”这一前提出发，宣称“部分无视商业标准、违反道德规则、滥用民事权力或违反美国法律的犹太人是犹太大家庭中的毒蛇。”^②这种对部分犹太人不当行为的强调，间接地反映了利文斯顿的想法，即他认为“反犹并非美国犹太人的错，是大规模东欧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掀起了这股浪潮”。^③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东欧犹太移民踏足美国后，给美国“本地犹太人”带来的困扰。

历史学家杰克·韦特海默（Jack Wertheimer）认为，利文斯顿的观点折射出了美国“本地犹太人”的恐惧：一个新的移民群体强加给了原本就定居在美国的犹太人以“令人厌恶”的特征，威胁到了所有犹太人的声誉。利文斯顿认为，新移民的某些行为表现是美国公众“诽谤犹太人思潮”日益增长的原因。出于对这些问题的考虑，利文斯顿提出了他的观点，他指出：美国犹太人的“首要责任”是“维护犹太人和犹太教的良好声誉”，在美国，应对“犹太人被诽谤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获得公众的“认可和尊重”。^④利文斯顿的阐述不无道理，但

^① Robert H. Williams, “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 and Its Use in the World Communist Offensive”, p. 5.

^② Robert Edward Edmondson, *B'nai B'rith: An International Anti-Christian, Pro-Communist Jewish Power*, p. 7.

^③ Jack Wertheimer, “The Founding of the ADL”, unpublished paper, p. 3.

^④ Robert Edward Edmondson, *B'nai B'rith: An International Anti-Christian, Pro-Communist Jewish Power*, p. 7.

想要解决反犹主义问题，还需要从反犹主义者的思考角度出发。

反犹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是公众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特别是部分东欧犹太移民令人厌恶的特征。只有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才能保护犹太人的安全，因此，宣传活动是十分有必要的，它能够改善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和打击反犹主义提供一种较好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圣约之子会需要唤醒全世界犹太人的良知，使他们自觉维护自己的犹太身份，用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承担起属于犹太人的集体责任。在提议成立宣传委员会后，利文斯顿领导了新成立的部门。他与威廉·威尔哈茨（William Wilhartz）和朱利叶斯·迈耶（Julius Meyer）一起给犹太媒体撰写了有关反犹主义的文章，并反对报纸、剧院和酒店广告中针对犹太人的诽谤事件。

到了1912年，宣传委员会不仅定期抗议第六区（“大湖区”）发生的诽谤犹太人的事件，还抗议发生在第六区以外的诽谤行为。^①随着该部门各种机制的顺利运行，扩大其活动范围的时机已经到来。1913年9月，圣约之子会主席克劳斯邀请了15名在芝加哥的圣约之子会的重要成员参加了一项会议。在会上，他们同意组织建立一个反诽谤联盟，在美国各个重要的城市中，该联盟都应该拥有代表。会议向大约150个人发出了信函，通知他们被任命为联盟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建立反诽谤委员会的想法激发了圣约之子会领导层的创造力，也反映出了该组织的普通会员的明确诉求。在美国的莫比尔、阿拉巴马、华盛顿、克利夫兰、俄亥俄和其他城市，圣约之子会的新闻报道狠狠地抨击了当地丑化犹太人形象的剧场演出和媒体漫画。尽管前几年犹太人在游说废除《俄美商业条约》方面取得了逐渐稳步的政治成功，但这些胜利随着迪林厄姆委员会出版报告所带来的失败而被抵消了，这份报告诋毁了包括东欧犹太人在内的“新”移民，并论证了“旧”移民的优越性，建议美国政府实行限制犹太人移民的措施，这无疑是对美国犹太人的巨大打击。

不只是新移民的问题，美国犹太人也对1911年来自俄国的关于逮捕犹太工人孟德尔·贝利斯（Mendel Baylis）的报道感到不安，他被指控谋杀了一名12岁的基督教男孩，目的是将孩子的血液用于宗教祭祀，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仅仅是因为贝利斯是犹太人，并且他工作的工厂离案发现场距离较近。俄国当地民众对贝利斯的不实控诉，再加上联想到同样针对犹太人的发生在东欧的19世纪60年代末的罗马尼亚大屠杀和1903年的基希涅夫大屠杀，使得美国犹太人对他们

^① Jack Wertheimer, “The Founding of the ADL”, p. 32.

生活中日益增长的反犹主义情绪变得更加敏感。^①我们可以简单将发生在贝利斯身上的一切定义为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式案件，而俄国当地政府对贝利斯的监禁在美国引发了犹太人大规模的抗议集会，数千人认为贝利斯无罪，呼吁当局将他释放。

当贝利斯一案引发媒体的关注时，佐治亚州传出了一件对美国犹太人更加刺激的审判消息。事情起源于1913年4月29日，美国警方逮捕了一名叫作利奥·弗兰克（Leo Frank）的年轻人，给定的罪名是他谋杀了一名14岁的美国女孩——玛丽·帕根（Mary Phagan）。当事人弗兰克出生于北美的德克萨斯州，在布鲁克林长大，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普拉特学院，后来弗兰克接受了一位叔叔的邀请，搬到了南方协助他在亚特兰大建立铅笔厂。定居南方以后，弗兰克很快就在那里的犹太社区中活跃起来。1910年，他与当地人结合组建了一个家庭，并且加入了圣约之子会，担任盖特市分会的主席。事实上，在被捕前两个月，弗兰克已经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企图解决关于犹太漫画在当地媒体频繁出现对犹太人所造成的困扰。

弗兰克案发生后，公众的注意力被迅速集中起来，因为它引发了一定程度的反犹主义。当弗兰克接受审判时，针对犹太人的威胁言论四处传播——法院之外，群众高呼“绞死犹太人”。尽管弗兰克被捕这件事引发了新的反犹主义情绪，但他的朋友们依然选择站在他的身边。为了表达对“弗兰克是无罪的”这一观点的信心，在新的任命会议上，盖特市分会一致同意仍然选举被监禁的弗兰克为主席。^②而弗兰克被定罪的速度如此之快，迫使他在亚特兰大的朋友们不得不向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主席路易斯·马歇尔寻求帮助。有几封信件甚至将弗兰克的案件定性为美国版的“德雷福斯事件”，而且几乎所有的信件都传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尽管警方掌握了唯一一条对弗兰克不利的证据，那么这条证据也仅仅是“对犹太人固有的偏见”。

与新生的圣约之子会反诽谤联盟做出的努力相比，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主席马歇尔的态度反映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对打击反犹太主义的不同态度。马歇尔认为，“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做了任何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那都将是非常不幸的。因为无论做了什么，都不能以这件事是否符合正义的标准来判断，而关于我们采取的一切行动是否在所谓的‘正义’范围内，都是由非犹

^① Bernard Postal, “B’nai B’rith: A Century of Service”, pp. 101-102.

^② Leonard Dinnerstein, *The Leo Frank Case*, pp. 75-76.

太人决定的。”^①马歇尔的态度代表了部分犹太人的态度，他们在反复横跳的反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变得麻木，似乎失去了争取胜利的信心，这点与圣约之子会为抗击反犹主义付出的行动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无论如何，打击反犹主义思潮都是美国甚至全世界犹太人的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尽管面对诸多的不公正待遇，面对无尽的诋毁，圣约之子会都在想办法改变。所以，无论是通过法律途径也好，还是舆论途径也罢，犹太人都会积极为自己辩护，直至他们能够受到公平对待。而解决这一切的根本，就是改变非犹太群体对犹太人固有的偏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圣约之子会及其附属机构反诽谤联盟一直在竭力以赴，承担起“为犹太人辩护”的责任。

（二）实行人道主义救援

1931年9月，德国纳粹党袭击了柏林街头的犹太人，他们将面临严重的危机。到了1933年，纳粹党下令所有国际组织在德国的分支机构解散，但德国圣约之子会主席贝克拒绝解散德国的圣约之子会。虽然如此，德国的圣约之子会还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它与美国总部的联系中断了，直到1937年才被允许正常运作。当时，纳粹党强行接管了该组织的财产，监禁了贝克，并在德国清算了圣约之子会。与此同时，国际圣约之子会主席科恩则敦促美国国务院帮助德国领土上的犹太人，理由是德国圣约之子会是美国圣约之子会的一个分支，因此，德国的圣约之子会值得保护，这是美国政府对保护美国组织的适当延伸。^②科恩向美国国务院提供了大量关于该分会在德国的慈善组织的信息，一定程度上来看，他对美国政府所施加的压力，很可能使德国的圣约之子会比德国其他的犹太兄弟组织所能存活的时间更长。

打击反犹主义，抵制纳粹的迫害需要主要犹太组织之间共同的合作与努力，但这似乎不可能实现，因为它们的意识形态是相互冲突的，并且尚未探索出符合各方利益的妥协方式；犹太人所面临的“纳粹主义的威胁”在不同的犹太组织中也有不同的解读，这些似乎只会加剧它们的分裂。然而，面对共同的敌人，美国犹太人选择继续尝试着团结起来。1933年2月，圣约之子会召集了美国犹太人大会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它们共同举行了代表会议。这两个组织也和圣约之子会一样，积极致力于打击反犹主义和捍卫犹太人的权利。圣约之子会试图制定三

^① Charles Reznikoff, ed., Louis Marshall: *Champion of Liberty*,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57, p. 297.

^② S. Z. Madni, “B’nai B’rith (Sons of Covenant)”, p. 82.

者间的合作计划，或者至少确保彼此间能协调活动。

这三个组织一致认为，“目前，群众抗议运动并不能对拯救德国犹太人起到很好的作用”，因此，他们成立了一个联合会议委员会以便“密切关注德国犹太人的情况。”^①结果，拟定的方案持续了还不到一个月，联合会议委员会就艰难地在自己所预设的计划方案上挣扎。虽然联合会议委员会赞成在纳粹夺取政权后采取大规模抗议集会、广泛宣传等其他书面或口头的方式来传递犹太人的不满，但圣约之子会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反对以喧闹骚动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圣约之子会愿意鼓励其会员以规模缩小到三万人以内的队伍进行抗议活动，但它更支持比较内敛的民主形式，比如请愿活动。但是在1933年3月的中旬，为了反击纳粹党对犹太人和犹太商店的袭击，美国犹太人大会决定不顾联合会议委员会的提议，转而采取大规模的抗议集会活动。

到了1937年，圣约之子会反击纳粹的政策遇到了最困难的考验。因为在这一年4月9日的上午七点，盖世太保突袭了整个第三帝国的圣约之子会会所，扣押了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并搜查了他们的家园……柏林分会的领导人和会员们更是被盖世太保戴上了手铐予以拘留，他们还被出示了一份‘解散令’，并被告知整个德国的圣约之子会已经不复存在。圣约之子会的所有财产——养老院、度假村、慈善学校甚至储备基金和银行账户——都被没收了。103家分会被迫关闭，会员们被迫遣散。^②处于美国的国际圣约之子会，对其德国分会所面临的危机感到十分焦虑，但却无能为力。

于是在1938年5月，绝望的科恩卸任了国际圣约之子会主席的职务，由亨利·蒙斯基（Henry Monsky）接任。蒙斯基就任圣约之子会主席的第一年就恰逢德国反犹太主义的加速发展时期，更可怕的是，反犹太主义正在逐步转化为更为广泛的恐怖主义。全世界的犹太人都认识到了逃离德国是他们能够生活下去的唯一希望，纳粹统治下的犹太难民问题不能再次被忽视了。1938年之前，纳粹利用经济和社会压力迫使犹太人移民，但1938年，只有25%的德国犹太人离开。为此，纳粹转向用恐怖手段来加快移民进程，并实施了完全的经济扼杀政策。到了1939年1月，犹太人甚至无法拥有商店或从事任何有关销售的职业，德国已经几乎没有对他们开放的经济活动领域了。事实上，大多数犹太人只能通过犹太社区找到

^① Moshe R. Gottlieb, “The Anti-Nazi Boycott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Ide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Appreciation”,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35, no. 3/4 (July-October 1973), pp. 198-199.

^② Moshe R. Gottlieb, “Reactions of American Jewish Defense Organizations to the Liquidation of the B’nai B’rith in Nazi Germany”, p. 287.

工作或者为犹太社区服务，然而犹太社区的经济资源也正在迅速减少。

而纳粹对奥地利进军更是推动着犹太难民问题向着更糟糕的方向演变。历史学家大卫·怀曼（David Wyman）曾指出，“对奥地利的 18 万犹太人来说，反犹主义意味着他们将立即受到迫害。反犹主义思想在德国经过了五年的发酵，两到三个月内就能在奥地利生效。”绝望的气氛笼罩着奥地利的犹太人，“外国领事馆内挤满了成千上万的寻求移民的人”，而“每天都有多达 170 名犹太人自杀。”^①慕尼黑会议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了德国，随后那里在 1938 年秋天也出现了类似的迫害场景。而 1942 年纳粹灭绝计划的披露，则彻底震惊了美国犹太人。1942 年 6 月 30 日，英国媒体和犹太电信社都报道了纳粹对犹太平民的大规模谋杀，并且相关报告指出，已有多达 100 多万德国犹太人被害。虽然起初这些报道被认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美国犹太人很快就接受了它们的可信度。到了秋天，甚至美国国务院也彻底证实了纳粹确实正在消灭犹太人。

1938 年 11 月的“水晶之夜”事件发生后，国际圣约之子会主席蒙斯基与其他犹太组织领导人一起前往了华盛顿，向美国国会表达了他们对欧洲犹太人的关切。不同于“水晶之夜”时美国犹太人的愤怒抗议，到了 1942 年纳粹执行犹太灭绝计划后，无助的犹太人开始直接去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请愿，恳求“美国和其他与轴心国交战的国家一起采取行动，拯救剩下的欧洲犹太人”^②。因为在这时，犹太人如果还采取保守的抗议策略，已经不能够来应对纳粹的暴行了。

与此同时，蒙斯基立即采取了行动，促进世界犹太人急需的团结。1943 年 1 月，他邀请了 34 个主要国家的犹太组织领导人参加在匹兹堡举行的一次预备会议，以制定有关“未来帮助欧洲犹太人所需行动”的计划。他提出，“近期的目标是尽可能多的拯救犹太生命”，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长期目标：“犹太人的战后地位问题和犹太人的定居地——巴勒斯坦的建设问题。”^③蒙斯基的行动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克劳斯主席的行动，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求团结，他们迫切希望建立一个能代表美国犹太人的民主机构。

而蒙斯基的呼吁是在 1942 年 5 月比尔特摩尔会议之后发出的——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有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首次聚集在一起。而随后举行的匹兹堡会议则主张将巴勒斯坦建立为犹太联邦，属于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派对

^① David S. Wyman, *Paper Walls: America and the Refugee Crisi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68, pp. 29-30.

^② Naomi Cohen, *Not Free to Desist*,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72, pp. 240-241.

^③ Edward E. Grusd, *B'nai B'rith: The Story of a Covenant*, p. 231.

温和的犹太复国主义派的胜利。相对于圣约之子会而言，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和犹太劳工委员会都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支持者。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致力于建立犹太联邦，蒙斯基认识到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和犹太劳工委员会纳入其战略同盟中的困难性。然而，在美国社会舞台上的所有犹太组织中，只有圣约之子会希望在不引起对立的情况下加强犹太人之间的团结。会议还成立了欧洲犹太人事务临时紧急委员会，负责处理欧洲犹太人的救援问题。临时委员会将一直存在，直到选出一个合适的指导委员会或中央组织为止。

1943年3月1日，在纽约曼哈顿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一场大规模集会上，公众的骚动达到了顶峰：因为华沙区仅存的犹太人们陷入了绝望的困境，罗斯福和国务院“通过胜利拯救欧洲犹太人”的政策给予不了美国犹太人希望。鉴于欧洲犹太人绝望的处境，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和犹太劳工委员会也不得不加入了匹兹堡会议方的合作，并于3月13日加入了紧急委员会，该委员会后来更名为欧洲犹太人事务紧急联合委员会，专门致力于欧洲犹太人的救援工作，同时也为罗斯福召集的于4月份即将召开的百慕大难民问题会议做准备。它还继续开展宣传活动，包括被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所厌恶的群众集会活动。几个月来，美国的犹太组织们似乎在救援问题上终于团结一致了起来。

在蒙斯基看来，“民主精神的发扬和民主进程的完善改变了犹太领导人们的整体观念，各犹太组织的领导人必须对他们的犹太同胞负责。”^①显然，美国犹太人希望彼此能够团结起来，采取行动拯救那些遭受纳粹恐怖袭击的犹太人。1943年8月召开了美国犹太人大会，蒙斯基作为会议的积极策划者兼主席作了重要的发言。他回顾了1918年召开的第一次美国犹太人大会，分析了如今的战争趋势，制定了一项旨在能确保美国犹太人在团结的基础上，从纳粹的毁灭行动中拯救欧洲犹太人的计划。

蒙斯基强调了“和谐与合作的精神”，并指出：“我们对犹太人的拯救取决于能否保持统一的战线，现在不是区分美国犹太人和海外犹太人的时候。”他重申，“他们的战斗就是我们的战斗”，“欧洲犹太人的最终命运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我们美国犹太人的命运”。他认为，在涉及犹太人利益问题上采取孤立措施对全体犹太人都是致命的，蒙斯基呼吁结束意识形态的对立，并指出“坚持意识形态的差异只会妨碍美国犹太人的行动效率”。会议的最后，他再次强调：“我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犹太群体，可以称之为宗教或民族共同体。怎么称呼这

^① Maurice Bisgyer, *Challenge and Encounter*, New York: Crown, 1967, pp. 77-78.

不重要，关键的是我们有共同的遗产、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宗教、共同的传统和共同的事业，我们必须为共同的基础而努力。”^①事实证明，圣约之子会是会议的积极策划者，它旨在确保美国犹太人在行动上的团结，以及从纳粹的毁灭性打击中拯救欧洲犹太人。

除了统一战线问题，美国犹太人还面临一个困难，即运用何种措施才能更好地拯救欧洲犹太人的问题。1943年8月，美国犹太人制定了两种救援计划：第一项提议是由美国犹太人大会提出的，主张通过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来救援和转移欧洲犹太人；第二项提议是由欧洲犹太人事务紧急联合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将建立国家的理念与救援欧洲犹太人的行动区分开来。这两种方案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各种资源都匮乏的情况要求美国犹太人必须在先救援再二次安置欧洲犹太人，和直接在巴勒斯坦建国安置欧洲犹太人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虽然后来的历史发展迹象表明“犹太复国主义者正确地认识到了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必要性”，但是现代历史学家怀疑，“一旦纳粹的灭绝计划开始了，……对国家的需要是否就应该让步于拯救欧洲犹太人的首要任务”^②。而蒙斯基的统一领导方案并没有给予“拯救欧洲犹太人”这一棘手问题最佳解答。

最终，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美国犹太人的切实行动和各民主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同时，仅靠民主的人道主义援助是不足以抗衡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的，全世界犹太人的共同努力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圣约之子会在实施人道主义援助、拯救欧洲犹太人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是不容忽视的，它为德国犹太人的安危事业奔走，积极响应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号召，真正体现了出色的犹太组织将民族利益置放于第一位的精神。

（三）捍卫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主权

20世纪30年代，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的顺利掌权给美国犹太人的生活蒙上了一层更深的阴影。事后来看，虽然反犹主义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并没有明显的恶化，但在犹太人进入大屠杀前的关键岁月里，反犹主义仍在美国持续存在着，足以让犹太人担忧并影响他们的自我认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犹太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纳粹主义的威胁，这并不是一种先例，因此帮助东欧犹太人逃离德国纳粹主义的魔爪迫在眉睫。

^① Maurice Bisgyer, *Challenge and Encounter*, p. 77.

^② Aaron Berman, *Abba Hillel Silver, Zionism and the Rescue of the European Jews*, ed. Paula Hy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Center for Israel and Jewish Studies, 1979, pp. 26-27.

不只是德国犹太人面临着困境，苏联犹太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而圣约之子会对欧洲犹太难民问题的看法，具体反映了美国通过第一项限制移民的法案后，其在墨西哥的难民与苏联的难民之间的关系。1924年，随着欧洲移民发现新移民法的漏洞，通过墨西哥间接移民到美国的人数达到了顶峰。虽然美国国会持限制移民主张的议员希望将配额制扩大到西半球以填补漏洞，但国务院反对为所有此类事务做出努力。由于担心墨西哥承担不了数量庞大的移民所带来的压力，转而对美国采取商业上的报复，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限制犹太移民进入墨西哥。通过严格执行1882颁布年的《公共收费限制条款》和1885年颁布的《合同劳工禁令》等规定，领事们减少了向潜在往墨西哥移民的犹太人发放签证的数量。^①墨西哥的基本情况为美国国务院和圣约之子会提供了一些参考价值，即如何合理地解决犹太移民问题值得圣约之子会和美国犹太人反复思量。

1921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马丁·齐隆卡拉比（Rabbi Martin Zielonka）的指导下，圣约之子会成立了一个墨西哥办事处，来帮助那里的犹太移民。该办事处协助在墨西哥的犹太人学习西班牙语课程，为他们提供食物、住宿和法律等方面的援助，并试图阻止犹太移民偷偷转移到美国。齐隆卡最初求助于专门帮助犹太移民的机构，如希伯来移民协助会（HIAS）、工业搬迁委员会（IRO）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但发现他们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办事处在芝加哥成立了一个私人的墨西哥犹太人移民定居协会，促使美国犹太人大会自愿调查前往墨西哥定居的前景，并向犹太地域组织报告调查结果。

但到了1923年1月，大会否决了定居计划，阻止犹太人移民到墨西哥，并指出：“所有可能对定居墨西哥感兴趣的人，墨西哥现在已经不能成为那些迫切地必须要为自己和家人找到工作和立足之地的人的避难所了。”^②与此同时，伴随着一战后英国控制了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圣约之子会组织领导人认为，与其把金钱投入到墨西哥，不如把这些金钱投入到巴勒斯坦，美国犹太人大会甚至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代表也这样认为。

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从犹太身份认同情绪的高涨中所获得的效益比圣约之子会更大。1935年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数量已经攀升到了80多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们的人数甚至超过了100万。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民族主义情绪随着欧洲犹太人日益严峻的处境而高涨。绝望的犹太人急需

^① Corinne A. Krause, "Mexico: Another Promised Land", *American Jewish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 61, no. 4 (June 1972), p. 338.

^② Ibid.

一个避难所，而定居巴勒斯坦的计划提供了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慈善家们说服圣约之子会扩大对巴勒斯坦救援项目的支持，就像它曾经资助齐隆卡在墨西哥的移民活动一样。1934年，圣约之子会在耶路撒冷为难民设立了一个庇护所，第二年圣约之子会成为第一次巴勒斯坦问题全国会议的发起人之一——该会议由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举办，旨在团结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非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加强巴勒斯坦的建设。在1936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圣约之子会主席科恩承诺圣约之子会将对建设巴勒斯坦做出支持，他说道：“在目前的情况下，定居巴勒斯坦的计划给全体犹太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希望，因此，帮助巴勒斯坦加速建设和提高它吸收难民的能力，必须被视为每一个犹太人和每一个犹太组织的神圣职责。”^①而面对接连而来的外部挑战，犹太人的团结意识也正在逐渐复苏。

圣约之子会履行了其承诺，开展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在巴勒斯坦购买足够的土地，供整个移民定居点使用，这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夏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提出的想法。这些土地将被捐赠给犹太国民基金会，并以圣约之子会的名义命名定居点。会议的执行委员会于1936年2月批准了筹集10万美元的提议，在宣布了这一项决定后，巴勒斯坦便发生了大规模的阿拉伯人反犹骚乱。尽管在最初的时候，圣约之子会担心其计划中的移民定居点问题可能会加剧阿拉伯-犹太人之间的紧张局势，因此而变得犹豫不决，但圣约之子会因为其支持巴勒斯坦犹太人定居点的决定而受到了各方的赞誉，所以它选择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

1945年，圣约之子会派出了包括其主席蒙斯基在内的顾问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旧金山会议。会议敦促“在国际联盟现有的授权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托管制度”，并指出，“任何计划都应当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广泛的适用范围，以便在这个框架内根据《贝尔福尔宣言》的基本意图和宗旨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第二年，蒙斯基还代表圣约之子会组织在英美—巴勒斯坦联合调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他主张“明确将巴勒斯坦重建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犹太联邦，并要求废除1939年5月英国提出的巴勒斯坦白皮书，打开巴勒斯坦的大门，使犹太人不受限制地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定居。”^②这不仅是圣约之子会组织的愿望，更是全体犹太人的共同愿望。

^① Myer Steinglass, "Palestine Unites American Jewry", *B'nai B'rith Magazine*, (March 1936), p. 186.

^② Richard Hofstadter, *Age of Refor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 pp. 80-81.

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意识到，只有一部分剩余的人需要被从欧洲带到巴勒斯坦，但他们坚持认为，拯救流离失所者与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他们本以为，先前提出的希望英国撤销白皮书并承认大屠杀幸存者的要求，可能会得到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和犹太劳工委员会的支持，但这两个组织都因难民危机往政治化方向演进而变得犹豫不决起来。战时建立并继续存在的由部分犹太组织组成的联合联络委员会仍然敦促美国接纳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倾向于同意这一想法，但国会中的持限制移民主张的人拒绝了放宽配额法的提议。后来，美国国会通过了接纳流离失所者的特别立法，但与此同时，这些法律歧视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尽管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同意支持 10 万名犹太幸存者立即进入巴勒斯坦，但该委员会却对建立犹太国家的前景不抱有太大的希望。

然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观点的美国犹太人迅速达成了共识。根据 1945 年的民意调查显示，90% 的美国犹太人都支持建立犹太国家，只有 10% 的人反对。当美国犹太拉比中央会议通过了一项反映这些趋势的决议时，少数持不同政见的改革派拉比组成了激进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美籍犹太教理事会。该理事会明确表达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不满，并从其他美国犹太组织中吸纳了同样持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但它从未赢得太多民众的支持。由此可见，犹太复国主义思潮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反犹太复国主义沦为美国犹太社区生活的边缘思想，圣约之子会便可以采取行动，缩小其主张与实践之间的差距。1947 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主张废除“允许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英国白皮书，并呼吁联合国“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家园。”^①考虑到蒙斯基代表犹太国家发表的公开声明，以及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建国的积极态度可能会落空，联合国方面不愿意表态明确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诉求，但它授权通过了一个拥有永久性美国犹太人大会成员资格的代表委员会，并批准了圣约之子会参加会议。

几个月后，当联合国宣布支持将巴勒斯坦划分为犹太和阿拉伯国家的消息传出后，在蒙斯基主席突然离世后当选为圣约之子会主席的弗兰克·戈德曼（Frank Goldman）给杜鲁门总统发了一封电报，他与前任主席蒙斯基所代表的圣约之子会采取了截然相反的行动——立即发表公开声明，支持分治原则。1947 年 11 月，当联合国通过分治计划的消息传来时，戈德曼主席在美国犹太组织会议上与大多数其他美国犹太组织的领袖们一致欢呼这一举措，庆祝圣约之子会的坚持终于得

^① Edward E. Grusd, *B'nai B'rith: The Story of a Covenant*, pp. 241-242.

到了回报。

圣约之子会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目标的间接支持,使其先前的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立场与如今的犹太复国主义实践之间的冲突合理化了。并且鉴于美国犹太人对于圣约之子会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做法的认同,使得圣约之子会能够继续在美国犹太人的生活中扮演着主流角色。在 1946 年,由圣约之子会分会主席莱斯特·古特曼(Lester Gutterman)领导的纽约圣约之子会分会成员独立为巴勒斯坦的犹太国防军“哈加纳”(Haganah)筹集了超过 5 万美元的战略资金。纳粹大屠杀的惨痛教训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美国犹太人接受和支持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犹太人反击敌人,并根据他们的需求来提供帮助。在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防御组织筹集资金的过程中,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方式来宣泄他们对纳粹屠杀欧洲手无寸铁的犹太人的愤怒之情——通过其他渠道支援他们。

圣约之子会的种种行为都表明了它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决心,其主席戈德曼都是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不避讳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介入美国犹太政治,他在确保杜鲁门总统支持巴勒斯坦分治政策方面也处于关键地位。杜鲁门总统并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然而,他最关心的是那些身处欧洲营地的流离失所的欧洲犹太人的困境。由于国会没有明确部分国家问题,美国的政治决策往往会根据杜鲁门的自我认知而摇摆不定,因此与总统的接触对美国犹太人来说变得至关重要。1947 年 3 月,戈德曼利用圣约之子会的成员身份,帮助自己打开了进入白宫的大门。后来,在 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宣布建国 5 分钟后,杜鲁门总统履行了他的承诺,美国站出来对其给予承认。

杜鲁德·维斯·罗斯马林(Trude Weiss-Rosmarin)在《犹太国家月刊》中写道:“美国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将不得不承担未来犹太世界的领导责任,大部分责任将移交给除了美国犹太人以外的更庞大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群体。”但维斯·罗斯马林认为有理由乐观起来,“美国犹太人正在成为犹太人新的重心,”^①她断言,随着以色列的建国,同为犹太同胞的他们对以色列国家的支持,将促使美国犹太人将在全球扮演新的角色,但这并不代表美国犹太人需要牺牲对他们所处的美国国家的关注。事实上,这两种立场似乎是互补的,这一情况具体反映在圣约之子会的政策中。在过去的十年中,圣约之子会承担了各种各样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事业的慈善义务。1936 年,圣约之子会同意拿出 10 万美元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作为犹太人第一个定居点的基础。1941 年,组织决定为毗

^① Trude Weiss-Rosmarin, "There Is Cause for Optimism", *National Jewish Monthly*, (January 1947), pp. 157-158.

邻第一个定居点的第二个定居点额外筹集 10 万美元。在早些时候，蒙斯基担任组织主席的时，1938 年召开的组织大会还投票决定在巴勒斯坦种植一片森林，并向犹太青年组织——阿里亚捐赠 1 万美元，以帮助在巴勒斯坦定居的欧洲犹太青年人。^①早在 1924 年，圣约之子会就积极支持在耶路撒冷成立不久的希伯来大学，并于 1945 年为其新开设的魏茨曼学院拨款。

与其他美国犹太组织一样，圣约之子会认识到需要把对新国家的支持放在组织议程的首要位置。但随着 1948 年的建国的愉悦气氛的过去，该组织再次面临了如何处理新兴以色列国家的问题：如何将感知到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的需求，转化为具体可执行计划。回顾 1947 年圣约之子会大会通过的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虽然它并没有明确表示其与未来建立的以色列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以色列的建立确实促进了巴勒斯坦犹太人与圣约之子会更密切的联系，以色列的许多慈善项目，都是由圣约之子会支持的。例如，1949 年圣约之子会妇女会承担了在以色列为那些受心理问题困扰的儿童建立一个家园的任务。这项任务是 1943 年在亨丽埃塔·绍尔德（Henrietta Szold）的要求下由当地的组织（当时在巴勒斯坦）建立的。他们在租来的房子里建立了这个爱心机构，帮助那些因经历大屠杀的恐怖袭击而内心变得伤痕累累的儿童们做心理康复。^②当圣约之子会妇女会租下了这所房子时，曾经发起了一项 10 万美元的捐赠运动，企图为以后的犹太慈善活动树立一种典范。

虽然圣约之子会随着以色列的建国而调整了它的政策方向，但是它在美国犹太社区中的重要地位并没有动摇，它成功地为美国各阶层的犹太人找寻到了可以归属的精神家园。尽管蒙斯基担任圣约之子会主席还不到十年的时间，但在他领导的这些年里，成功地解决了该组织近二十年来所面临的问题。出于战时的紧急需要，他积极建立了一个团结的犹太组织平台，使得其他犹太组织将在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继续与圣约之子会合作。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战后赔偿问题也提上日程。1951 年 9 月，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代表德国人民承担起了对纳粹大屠杀中犹太受害者的责任，他宣布：“纳粹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了无法容忍的罪行，德国有义务做出道义上和物质上的赔偿，无论是关于犹太人民遭受的个人损

^① Edward E. Grusd, "B'nai B'rith Hails the New State", *National Jewish Monthly*, (June 1948), p. 354.

^② Deborah Dash Moore, *B'nai B'rith and the Challenge of Ethnic Leadership*, p. 204.

害，还是关于无法确定索赔人的犹太财产。”^①同年10月，基于有些组织已经开始自行要求德国归还犹太财产，圣约之子会主席戈德曼不得不组织了一次讨论“关于犹太人应如何对德国提出物质要求赔偿”的会议，以协调22个主要犹太组织的活动。

圣约之子会主席戈德曼是索赔会议五人主席团的成员之一，成员们一致同意一项原则，即代表犹太人社区和以色列国家的组织有权获得无继承人的犹太财产的赔偿，尽管他们其中有些犹太人当时没有被迫卷入战争之中，抑或是“自愿”将其财产转移给纳粹的，但是他们仍有资格获得赔偿。总之，索赔会议默许了集体主义原则和以色列国的代表作用，并阐述了“犹太人”作为一个实体的概念，他们有权要求合理的赔偿。在继续寻求归还1937年被纳粹没收的犹太财产的同时，圣约之子会也积极参加了索赔会议。1952年，戈德曼加入了以色列政府，与德国政府就犹太人的战后索赔问题展开了正式的谈判。

莫里斯·比斯杰（Maurice Bisgyer）指出，“每个人都认识到任何金钱都无法补偿生命的损失或犹太人遭受的痛苦，但是，可以努力争取被夺走的财产损失或索要物质赔偿。”^②而历史学家内奥米·科恩（Naomi Cohen）则指出，圣约之子会参与索赔会议反映了其愿意将自身的组织特权置于更大的犹太群体特权之下。它认识到，所有涉及索赔的问题想要取得成功，需要所有犹太组织的共同努力，并超越组织自身更具体和更具法律依据的归还要求。^③

同时，圣约之子会积极参加以色列—犹太复兴全国规划会议，促进了同其他犹太组织之间有限的合作。戈德曼主席还与其他美国犹太组织领导人们一起与杜鲁门总统会晤，以获得复兴规划会议批准的援助以色列的贷款或赠款。当以色列决定发行第一批债券时，圣约之子会热情地认购了它们。事实上，在15年的时间中，该组织购买了价值8000万美元的债券，比其他任何美国犹太组织都要多。作为组织的主席，戈德曼本着务实行动的原则，坚持运用选择性政策，避免了犹太人领导权的冲突和组织间合作的矛盾等棘手的问题。

1953年，圣约之子会选择了一位渴望解决蒙斯基遗留下来的问题的领导人——菲利普·克鲁兹尼克（Philip Klutznick）担任新主席。早在1950年，克鲁兹尼克就参加了主席的竞选活动，但是在当时以失败告终。幸运的是，他只等了三年就赢得了这个职位。克鲁兹尼克坚信，圣约之子会主席也应该是美国犹太人的

^① Naomi Cohen, *Not Free to Desist*, p. 279.

^② Maurice Bisgyer, *Challenge and Encounter*, p. 119.

^③ Naomi Cohen, *Not Free to Desist*, p. 279.

领袖，他尽职尽责，努力将自己的主席职位塑造得无可争议。在长达六年的任期内，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不仅重新定义了圣约之子会与美国犹太人政治舞台上其他组织的关系，还大幅修改了美国犹太人所期望的领导标准，同时积极领导着组织为以色列国的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然而，在众多犹太组织中，正是圣约之子会首先提出了适时修改其组织的政策方向，并将以色列国的需求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范围。在调整对以色列国政策方向的同时，圣约之子会还扩大了几个新的社会服务项目。事情要追溯到 19 世纪 40 年代，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阶段，社会在进行重建，经济萧条也在逐渐缓和，大环境十分有助于改善组织的财务危机：而且随着战后圣约之子会组织成员的增加，财务危机慢慢得到了缓解并且逐渐消失了，这也使得组织能够抽出更多资金，更大限度地支援以色列国的建设。除此之外，圣约之子会最大的贡献在于，在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争取权利的过程中，它不仅帮助捍卫了新兴的以色列国的主权，而且增强了犹太民族的凝聚力。

二、帮助和服务犹太社区

（一）关爱老幼生活

随着圣约之子会组织的发展，它的目标也在不断扩大，除了关心犹太人的生活状况外，它还致力于改善全球人民，特别是老人和儿童的生活质量。它积极在以色列倡导和推进人权事业，在其他国家乃至全球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它极力确保低收入的老年人能获得安全且负担得起的住房，并就有关老年人及其家庭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宣传，努力改善老年人居住的社区环境并帮助一些正处于危机中的社区。

首先，圣约之子会特别关注老年人的医疗健康状态。早在 1866 年 7 月，圣约之子会关爱弱势群体的想法就得到了实行，它为老年人、残疾人和穷人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家园。在 1878 年黄热病流行的灾难性期间，圣约之子会更是和希伯来联合救济协会（UHRA）一起于建造了一所与老年人之家相结合的犹太医院。^①圣约之子会也曾公开表示过，它很自豪能够成为美国联邦老年人补贴住房的最大犹太赞助商，时至今日，它在 26 个社区拥有 42 座建筑。^②圣约之子会还与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合作，为收入有限的老年人提供公寓出租的服务。圣约之子会的

^① Cornelia Wilhelm, *The Independent Orders of B'nai B'rith and True Sisters: Pioneers of a New Jewish Identity, 1843-1914*, p. 134.

^② [http://www.bnaibrith.org/\[2022-11-27\]](http://www.bnaibrith.org/[2022-11-27]).

高级住房向所有符合条件的个人开放，不分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健康，甚至国籍。圣约之子会在保护老年人和倡导老龄化问题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专业知识，在涉及关爱和关怀老年人生活这方面，它具有一定的权威和影响力。

此外，自 1865 年以来，圣约之子会一直在积极筹集资金来帮助世界各地的灾难受害者，特别是老年人群体。在救援人员完成重要的救人工作后，圣约之子会将继续帮助社区，并履行这项承诺至很长一段时间。此外，圣约之子会的志愿者积极参与组织所在社区的各种当地项目，比如，为独身一人或行动不便而无法庆祝节日的老年犹太居民分发适时的食物，为收容所和学校筹集、分发烘焙食品，为贫穷、饥饿的人提供温饱食物等等。随着美国犹太人口的老龄化，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成为圣约之子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焦点。

为孤儿提供特殊保护和悉心照顾，承担抚养他们的责任，像对待珍宝一样呵护他们，是犹太教最重要的戒律之一。因此，圣约之子会除了帮助照料老年人的生活之外，也积极关注犹太儿童的健康成长。早在 19 世纪中叶，圣约之子会就出台过针对组织成员子女的批量人寿保险计划，为儿童们提供了规避风险的保障。在父亲或双亲死亡的情况下，圣约之子会不仅要拿出财政拨款为这些儿童们提供住宿，还要负责照顾这些儿童，并作为他们的监护人积极地保护他们。在欧洲的传统社区，犹太孤儿与亲人住在一起或住在特殊的医院里。

与欧洲不同，圣约之子会在美国设立了孤儿院，企图为这些儿童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1854 年，组织首次讨论了如何引入基金来资助一个孤儿院项目，该项目将能够代表组织的更高目标。^①由于当时美国的犹太孤儿数量很少，没有一个专门的犹太机构来接纳他们，这些犹太人孤儿一般都被送往基督教机构或家庭，在那里他们将面临被迫皈依基督教的风险。所以在美国建设孤儿院对于圣约之子会来说，就更加义不容辞了。

与此同时，由于圣约之子会妇女会在美国第二区的慷慨捐款，在圣约之子会本身已经筹集到的 1,1255 美元资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7688 美元，加快了孤儿院建设项目的快速推进。1867 年 7 月 31 日，美国第二区分会的主要代表们在纽约市会面，考察那里的孤儿院等类似机构，并讨论计划建设中的孤儿院的具体位置。位于美国中部的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和克利夫兰等城市都是建设孤儿院项目的入围城市。1868 年 2 月 4 日，孤儿院项目管理委员会最终选定了克利夫兰，

^① Isidor Busch, "The Jewish Orphan Asylum, Cleveland O.", *Menorah*, (July 1888), pp. 24-26.

并以 3,1000 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一处合适的房地产，用作孤儿院建设的基地。^①

当时，犹太妇女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不能在犹太事务中发挥中心作用，她们也很少公开发表言论，更不要说成为犹太人事业的主要支持者。但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圣约之子会妇女会出于战争的需要做了一系列慈善工作，并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组织逐渐认识到了女性在慈善工作和募捐领域的巨大潜力。因此，犹太妇女对孤儿院的建立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绝非偶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圣约之子会的许多分会收养了 600 余名生活在欧洲的贫困犹太儿童，对他们的学费、生活必需品和住所等进行了补贴。1938 年，在一些美国分会的支持下，伦敦的圣约之子会妇女为那些没有父母并且被迫离开德国的犹太儿童和青少年设立了一个青少年之家。此后，圣约之子会也一直积极践行着自己“关怀儿童”的目标，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和丰富的物质资源。

（二）创办教育事业

圣约之子会自成立之初，就积极关注教育问题。该组织积极在美国建设公共图书馆，向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内的所有人开放，供公众阅读，举办集会和讲座等活动使用，这强调了图书馆在实现圣约之子会教育目标方面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圣约之子会成立后所设立的第一个公开机构，便是在美国成立了第一家犹太公共图书馆——迈蒙尼德（Maimonides Library）图书馆。迈蒙尼德图书馆于 1852 年 1 月 25 日在纽约市开业，很快便发展成为圣约之子会社会生活的支柱。

^②圣约之子会主席亨利·琼斯（Henry Jones）在迈蒙尼德图书馆的成立仪式上阐述了该图书馆的创办宗旨，他明确强调了圣约之子会希望通过筹建图书馆事业，以实现广泛社会影响的愿望，指出组织新成立的图书馆旨在“在大众中”传播高等教育理念和先进文化知识。

圣约之子会在纽约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得很繁荣，到了 1858 年，它不仅拥有藏书 1010 卷，而且还在周末定期举办学术讲座。讲座的主题大都反映了广泛的社会利益，并就公共问题交换了意见，这些活动有时还伴随着音乐表演或者音乐会。1858 年 12 月至 1859 年 4 月，图书馆举办的系列讲座包括“学校教育 with 宗教教育的辨析”和“如何教授学生在小学阅读圣经”等主题，这些主题灵感来源于公立学校的不断合并和宗教学校面临的危机。^③

^① Emanuel Friedlein, “Twenty- Fifth Anniversary of Emanuel Lodge, UOTS”, *Jewish Times*, April 28, 1871, p. 135.

^② Bien, “History XVII”, *Menorah*, October 1887, p. 246.

^③ Cornelia Wilhelm, *The Independent Orders of B'nai B'rith and True Sisters: Pioneers of a New*

事实证明，圣约之子会在纽约建立图书馆的决策是非常正确且成功的，该图书馆基本上可以作为启蒙犹太人的社会平台和连接犹太人的联络点。鉴于纽约市图书馆的成功，美国的其他城市也建立了类似的机构。比如，1858年，圣约之子会在辛辛那提建立了门德尔松图书馆（Mendelssohn Library），其藏书量在500到600本之间。随后，巴尔的摩分会创建了圣约图书馆，据1871年的《犹太时报》报道，圣约图书馆的藏书量高达2000卷，比纽约的迈蒙尼德斯图书馆还要多。每周末，圣约之子会从事社会学和文学方面工作的成员会定期在旧金山举行会议，会议的内容对公众开放。

1868年，圣约之子会成员决定再开设一个特殊的图书馆，以配合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所以不久后，芝加哥也开设了一个图书馆，同时成立了圣约之子会芝加哥分会。在费城，众多分会也决定于1868年建造自己的图书馆。圣约之子会表示，它希望不止是组织的会员，包括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以及其他美国社会的公民，都可以好好利用这一座座公共图书馆，并期盼这些图书馆能够对公众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前从事现代图书馆系统研究方面的学者们，高度赞扬了圣约之子会是建立美国公共犹太图书馆的先驱组织。

圣约之子会一直提倡实行多元化教育，除了在美国开设图书馆外，它也积极在耶路撒冷推进图书教育事业。以色列的孩子们可以从圣约之子会赞助的图书馆里借阅书籍，丰富知识和增长见识。与此同时，圣约之子会通过其在巴勒斯坦的分会所建立的图书馆，为以色列的公共图书馆系统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以色列教育事业的发展。

圣约之子会的教育理念不仅局限于兴建公共图书馆，它还试图建立一所犹太大学。时任圣约之子会主席的怀斯成功说服了来自克利夫兰的年轻犹太律师佩克斯·奥托（Peix Otto）和来自路易斯维尔的威廉·克里格沙贝尔（William Kriegshaber），共同商讨于1866年将大学教育问题重新引入该组织的进程。作为组织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佩克斯·奥托明确主张设立一项“教育基金”，用来建立一所圣约之子会大学。

除此之外，在一次新闻宣传活动中，怀斯提到了他在以色列和辛辛那提的教育项目，并提出了通过圣约之子会的资助建立一所“犹太神学院式”大学的可能性。虽然组织明确指出，这样的大学教育项目绝对不能偏袒任何宗教派别，大学除了开设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等基本课程之外，还应该教授希伯来语、文学和犹

Jewish Identity, 1843-1914, pp. 122-123.

太历史等课程。^①组织指出，犹太人想要像中世纪那样，在自己的学术机构中与非犹太人分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组织中的美国犹太基督徒成员却认为，此类项目不应鼓励犹太人追求中世纪教育中的那些狭隘和老式的课程，而应该鼓励他们做到“真正的学术自由”；只有美国的犹太教才真正需要“犹太神学院”，美国的犹太大学并不需要这些。因为圣约之子会是所有宗教和非宗教取向成员共同的家园，所以关于建立一所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值得圣约之子会认真考量。

除了试图建立犹太大学，圣约之子会还积极参与创办犹太教育研究所，由温斯坦主席阐述了其创办宗旨：“终身学习是传统犹太教的基本理念，也是犹太人维系生存的主要动力之一。”^②单纯的只教育犹太儿童是不够的，成年美国犹太人也需要接受教育培训，以便在新世纪继承和发扬犹太文化遗产，这是他们经历过大屠杀事件后必须承担起来的新责任。温斯坦还批评了犹太成人的教育理念完全隶属于犹太会堂体系的观点，他坚持认为“任何不把传播犹太先进知识作为首要立场的活动，都是对犹太人过去遭遇不幸的默认，一定会促成犹太人未来的失败”^③。在温斯坦的推动下，圣约之子会于1950年成立了其成人犹太教育委员会，以这种方式承担起了在自由社会中解决美国犹太人教育和文化需求的责任。

此外，其成人犹太学习计划不仅反映了犹太人的价值观，还反映了美国人的价值观。言论自由是该学习计划的重要基石之一，保证拥有不同意识形态的犹太人都会有机会各抒己见。成人犹太教育委员会尽量避免不同党派之间的偏见，积极从各种宗教团体以及世俗思想家中聘请拉比教学。圣约之子会在其机构内部也促进了意识形态的多样性，越来越多的同质性思想在美国犹太人的生活中传播，并且在之前有争议的话题上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它甚至想把意第绪语和文学纳入其成人犹太学习计划。

1954年，在圣约之子会主席克鲁兹尼克的努力下，拉比哈罗德·魏斯伯格（Harold Weisberg）领导了这项新计划。在魏斯伯格专业且娴熟的指挥下，圣约之子会开始着手执行它那颇具创新色彩的成人犹太教育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综合犹太和美国价值观，与当代美国犹太人对话。成人犹太教育计划沿用了终身学习的理念，企图为成年犹太人创造最佳教育模式，例如，芝加哥大学曾为犹太人

^① Ben V. Dwoskin, *Soci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Affiliation or Non-affiliation in the B'nai B'rith Hillel Foundation of Selected College Students*, Ann Arbor: Pro Quest LLC., 1950, p. 45.

^② B'nai B'rith, *A Manual of Operations*, Washington: B'nai B'rith Institutes of Judaism, 2019, p. 11.

^③ *Ibid.*

推出了“阅读古老书籍”和“提出重要问题”的教育项目。魏斯伯格采取尊重犹太人生活和思想的方式，努力将犹太文化融入美国教育的框架之中。作为犹太拉比末底改·卡普兰（Mordecai Kaplan）的弟子，魏斯伯格分享了末底改关于犹太教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宗教文明”的特征和观点，^①指出犹太宗教和世界文化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当今世界的犹太人，特别是在美国社会中生存的犹太人，会发现自己两种文明的继承人——美国文明和犹太文明，而美国犹太人需要通过教育吸取两种文化的精髓，才能更好地适应他们现在的生活。

与此同时，拉比杰克·贝姆帕德（Jack Bemporad）则接受圣约之子会的委托，在位于北卡罗来纳州蓝岭山脉的荒地建立了犹太教研究所，后来研究所的思想成果不断发展，在整个美国流行和传播起来。在他们的巅峰时期，圣约之子会的成人犹太教育方案每年在 30 多个学院展开实施。而圣约之子会对兴建公共图书馆和创办学校教育事业的热衷，表明了该组织不仅关注犹太人的生存与生活，教化和文明也是该组织关注的重要方向。

（三）开展职业培训

圣约之子会还积极为犹太人开展职业培训，包括对孤儿的职业培训。因为组织发现，按照现代标准，如今孤儿院等机构的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过程中传递给儿童的价值观似乎很有问题。它们只是符合当时的标准，甚至只是明确地遵循了德国孤儿院要求的爱幼模式——仅在营养、卫生和保健等生活问题上代表了现代育儿模式。但是，合格的孤儿院不只要关注孤儿的健康问题，而且要成为孤儿性格形成和思想进步的孵化基地。因此，圣约之子会指出，在教学的过程中，孤儿院机构应该运用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全新的教育理念，并将这些思想理念在各机构的教学过程中传承和发展下来。在机构中，儿童们学习基本的阅读、写作和算术，以及希伯来语、德语和犹太教教义。而且，机构一有机会便有意地地为其他孤儿提供职业培训，这背后的意图是防止这些犹太男孩长大后从事“典型的犹太商人”职业，促进犹太人从事职业的多样性发展。

圣约之子会还呼吁在美国某些地区的大城市建立特殊的劳动福利保障局，即所谓的就业局，这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因为它产生了整合和动员组织中的工人成员的效果。其实早在 1851 年，圣约之子会就建立了希伯来农业协会，以培训移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当来自东欧的贫困犹太人前往美

^① Morris Adler, *The Objectives of the B'nai B'rith Institutes of Judaism*, Washington: B'nai B'rith Department of Adult Jewish Education, n.d., pp. 10-11.

国移民的浪潮兴起，便激发了圣约之子会自身甚至其他犹太组织对移民问题的关注，并积极寻求统一的措施来援助东欧犹太移民。比如前面提到的，组织在美国所有的大城市里为新移民开设了夜间学校和就业局。^①随后圣约之子会在 1901 年成立了工业搬迁办公室（IRO），以取代就业局作为移民安置代理点的地位。^②就业局曾试图让俄罗斯移民从事农业工作，部分是在圣约之子会组织和美国希伯来公理会联合会（UAHC）共同开发的定居点进行农业活动，这表明长期以来，圣约之子会希望减少从事商业职业的犹太人的数量。本着这种精神，组织在芝加哥、新奥尔良和费城建立了自己的职业培训学校，根据组织的理念塑造年轻一代，也就是第二代移民，企图使他们对手工工作和工匠职业产生兴趣。

后来，圣约之子会在芝加哥的职业培训学校被希伯来联合救济协会（UHRA）接管，它由约翰娜（Johanna）分会的成员经营，并取得了成功。相比之下，费城的学校招收的犹太学生十分有限，倒是招收了不少非犹太学生，因此，该机构于 1907 年关闭了。圣约之子会提供就业机会和职业培训的举措表明，这些项目只有和当地的其他学校积极展开合作才能成功。鉴于移民城镇中日益严重的住房、就业等社会问题，1892 年，圣约之子会开始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等组织正式协调其部分项目，建立成人夜校、劳动交流所以及工匠培训学校。除此之外，圣约之子会还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为美国大城市以外求职的移民提供工作岗位，目的是加快他们适应美国文化，推进自身的美国化进程。

三、参与国际事务

（一）参与联合国事务

圣约之子会参与国际事务的渊源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60 年代末，当时在罗马尼亚爆发了犹太大屠杀，罗马尼亚的反犹主义思潮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在圣约之子会的影响下，美国政府在那里设立了领事馆，美国总统格兰特还任命了圣约之子会的前主席，杰出的编辑兼律师本杰明·佩吉诃德（Benjamin Peixotto）为美国驻罗马尼亚领事馆的领事，协调处理相关问题。^③美国对罗马尼亚犹太人的命运十分关注，佩吉诃德的肩负着美国人和犹太人共同的期盼，美国国务院也向罗马尼亚政府发出了照会，希望他们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迫害。

^① Bernard Postal, "B'nai B'rith: A Century of Service", p. 106.

^②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nstitution Grand Lodge, "Dispersing the Ghetto", IOBB, IOBB Archives; Glazier, 1901-2, 15-19, p. 15.

^③ Bernard Postal, "B'nai B'rith: A Century of Service", p. 101.

1911年,圣约之子会参加了在德国萨克森州的德累斯顿举行的国际卫生展示会。该组织通过几个原始出版物向非犹太公众骄傲地介绍了它优越的组织制度和先进的医疗卫生体系,表现出了其较为完善的发展机制和发展成果。

1945年6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的旧金山召开,时任圣约之子会主席的亨利·蒙斯基率领一组由犹太人代表组成的国际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蒙斯基在大会上强调,正如《贝尔福宣言》所强调的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的赞同,以及英国所承认的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国际组织十分有必要保护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权利。^①这不仅是圣约之子会对犹太人权利保护的体现,更是其关注国际事务的体现。

圣约之子会出席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后,对当时的巴勒斯坦局势也一直持续关注,并为犹太人能在巴勒斯坦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而奔走努力。在以色列建国以后,圣约之子会也一直作为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倡导对以色列人权乃至全球人权的保护,并在这些活动中一直发挥着积极稳定的作用。

（二）开展国际救援

圣约之子会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持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救援活动。1868年,一场毁灭性的洪水淹没了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圣约之子会迅速做出反应,参与了针对巴尔的摩的救灾行动,并积极制定了救灾方案。圣约之子会的这项救济行动比美国红十字会的成立还要早13年,是美国国内许多救济计划中的第一个。也是在1868年,圣约之子会通过其对世界以色列人联盟组织(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的财政支持,将救济活动扩展到北非和中东的犹太社区,这是该组织进行的第一个国际项目。^②同年,圣约之子会还赞助了它的第一个海外慈善项目,筹集了4,522美元,以帮助当时巴勒斯坦霍乱流行病的受害者。

圣约之子会第七大分会——孟菲斯分会(Grand Lodge No.7)始建于1873年,而1873年恰逢孟菲斯黄热病流行期间。时任孟菲斯分会主席的是亚伯拉罕·埃弗莱姆·弗兰克兰德(Abraham Ephraim Frankland),他是一名美国商人。在疫情期间,弗兰克兰德积极帮助了患有黄热病的圣约之子会成员,对他们表现出了兄弟般的关怀,还领导了希伯来医院救济协会。除此之外,弗兰克兰德还致

^① Maurice Bisgyer, *Challenge and Encounter*, p. 178.

^② Deborah Dash Moore, *B'nai B'rith and the Challenge of Ethnic Leadership*, p. 29.

力于霍华德协会的慈善事业，该协会是 1853 年黄热病流行期间在新奥尔良成立的，成立之初弗兰克兰德曾担任其理事。霍华德协会是一个综合性的慈善团体，它积极运输药物、派遣医生和护士去往全国各地，照顾病人并满足他们的需求。

^①弗兰克兰德卸任以后，为了纪念他，圣约之子会孟菲斯分会还特地举行了一场集会，所有成员都聚集在一起来表达对弗兰克兰德的致敬，弗兰克兰德也因其在为同胞服务方面的显著个人成就而获得了圣约之子会颁发的奖章。

随着圣约之子会会员数量的持续增长，以及其组织在美国的不断拓展，考虑到各个分会普遍存在不同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如气候条件、风险条件甚至会员人数和会员年龄等因素，再加上受 1871 年芝加哥大火和 1873 年南方黄热病疫情的影响，所有会员都渴望在重大灾难发生后得到较好的安全保障，于是在 1868 年至 1873 年间，圣约之子会在各个地区的分会推出了人寿保险，帮助成员减小灾害带来的损失。^②19 世纪 70 年代初，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以及田纳西州爆发了严重的黄热病疫情，灾害晚期，新成立的第七区（指疫情和灾难肆虐的南方）大分会在相互团结的基础上，推出了针对灾后迫切需要被保护的寡妇和孤儿的特殊立法，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圣约之子会还特别关注美国各州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需求，积极与当地社区合作，支持各社区现有的机构。这种意愿首先出现在美国南部各州，由于这些州气候条件较为不利，故居民健康状况也较为堪忧，可供投入的医疗资源尤其紧张。因此在这些地方，圣约之子会首次有机会开发一种新型的医疗救护模式，来援助当地居民。1854 年，在圣约之子会成员犹大·特拉（Judah Tuoro）的倡议下，组织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建立了一家犹太人医院，里面配备了先进的医疗设施，就像前面提到的例子一样，医院也向非犹太人开放，并与当地的外国领事馆签订了合同，医院会同时照顾外国的船员，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

1871 年，美国芝加哥发生了一场大火，圣约之子会积极筹集资金，为芝加哥大火的幸存者提供援助。1873 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黄热病。在黄热病流行过后，美国中南部大量的犹太居民仍然受到疾病的影响，全国各地的圣约之子会分会为病人们提供了医疗援助，帮助他们度过了疾病的难关。1900 年，一场飓风摧毁了德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后，圣约之子会为救灾筹集资金，帮助在飓风

^① Selma S. A Lewis, *Biblical People in the Bible Belt: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Memphis, Tennessee, 1840s- 1960s*, Macon, GA: Mercer, 1998, p. 59.

^②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nstitution Grand Lodge of the IOBB, 1873, 31ff., IOBB Archives.

中受害的居民和家庭。1906年，地震灾害袭击了旧金山，圣约之子会施以援手，参与了旧金山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①

1903年4月19日至21日，俄罗斯比萨拉比亚的基希涅夫发生了一场有组织的犹太大屠杀，对于当时来说，可以称作“迄今为止最残酷、最骇人听闻的”反犹主义袭击，大约造成了150人死亡，而且造成了大规模的财物损坏。美国犹太人立即做出公开反应，老牌德国犹太人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首先呼吁为基什涅夫的灾民筹集资金，美国希伯来公理会联合会代表西蒙·沃尔夫（Simon Wolf）也向时任圣约之子会主席的利奥·列维（Leo N. Levi）求助，请求圣约之子会为大屠杀受害者提供物质方面的援助。

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和媒体报道，列维似乎拒绝了沃尔夫的请求。但事实是，列维实质上并没有拒绝沃尔夫利用圣约之子会筹集的资金来直接援助受害者的请求。但同时他也指出，直接援助受害者并不能长期解决俄罗斯的反犹问题，他说道：“他们唯一的救赎就是离开那个国家，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建立自己的家园。”^②另一方面，美国犹太人应该为预期的东欧移民浪潮做好准备，他认为这是拯救俄罗斯犹太人唯一的可持续的方法。总的来说，列维努力寻求的是欧洲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之间更好的合作，以便在长期内达成更有成效的拯救犹太人和打击反犹主义的政策共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军战舰基地珍珠港，随后美国宣布对日作战，正式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美参战期间，圣约之子会的成员在美国国家武装部队服役，并在国内前线协助美军作战。二战结束后，圣约之子会及其成员因在战争中的表现与努力，而得到了美国海军和陆军的双重认可，在美犹太人的地位也随之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三）支持以色列作战

圣约之子会是以色列国在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世界各国的活动以及各种国际组织中的坚定支持者和捍卫者。圣约之子会在耶路撒冷的世界中心是该组织与以色列政府、学术文化机构进行广泛联系的重要场所，也是圣约之子会组织对以色列政府、国家机构还有以色列非政府组织声音的重要聆听机构，它积极赞助各种文化交流项目。作为“以色列—援助”组织的创始机构，世界中心与许多其他

^① [http://www.bnaibrith.org/\[2022-11-27\]](http://www.bnaibrith.org/[2022-11-27]).

^② Leo N. Levi to George Peixotto, April 24, 1903, Drawer 8, Letters, IOBB Archives.

以色列救援组织开展过合作。^①而通过世界中心举办的各种交流活动，也使得以色列与海外侨民的关系更加牢固。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隔天凌晨，阿拉伯国家联盟便集结军队向以色列发动进攻。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了，以色列不得不迅速做出反应，开始学会在独立战争中保卫自己。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团结了起来，纷纷向以色列捐赠武器、弹药。在1948年以色列独立后动荡的日子里，圣约之子会也展现了其对新生的犹太国家的承诺和支持，它向以色列运送了大量的食物、衣服、卡车和其他紧急战备物资。同时圣约之子会启动了一项新的援助计划，一艘从纽约启航的圣约之子会食品船满载了22万多罐食品，总价值约100万美元，朝着以色列的方向前进了。船上赫然拉起的横幅“圣约之子会开往以色列的食品船”^②，表达了组织对巴勒斯坦犹太人命运的关注，以及对新兴犹太国家的大力支持。

圣约之子会的各项活动表明，该组织是犹太人权利的忠实维护者和巴勒斯坦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圣约之子会对犹太人权利的保护小到为他们提供生活资源 and 教育培训，大到支持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为此，该组织不仅努力抗击反犹主义，而且积极参加各种国际事务，通过舆论和政治双重手段为犹太人谋福祉。事实证明，圣约之子会对美国、以色列乃至世界各地犹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 <http://www.bnaibrith.org/>[2022-11-27].

^② Deborah Dash Moore, *B'nai B'rith and the Challenge of Ethnic Leadership*, p. 206.

第三章 圣约之子会的主要影响

圣约之子会自 19 世纪在北美大陆诞生,已经在超过 60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会。作为潜力最大的世界犹太组织之一,圣约之子会起到了团结犹太人和改善犹太人生活状况的积极作用。通过建立犹太医院和改造犹太社区,圣约之子会提高了犹太人的生活质量。在犹太移民融入到美国的过程之中,圣约之子会帮助犹太人认清了自己的犹太身份,同时向他们传播了美国社会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加速了他们融入美国社会的进程。

随着圣约之子会组织在美国的规模日益庞大,它的影响力也随之增强,与美国政府的合作也日渐密切。圣约之子会与其他犹太组织一道,企图为 20 世纪的苏联犹太人争取向美国移民的机会,并起到了不容小觑的推动作用。圣约之子会还积极尝试与美国领导人接触,为美国犹太人谋得了更多的政治利益,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美国犹太人的政治地位。

一、对犹太人的影响

(一) 团结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首先,圣约之子会团结犹太人的思想体现在它的组织策略上。虽然我们不可能详细地追溯圣约之子会在欧洲和中东的发展史,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作为一个新型的组织促进了犹太力量的团结,并且引入了先进的犹太意识。事实表明,即使在远离美国的欧洲,圣约之子会也释放出了一种积极且深远的影响,这反映了该组织作为美国新犹太身份象征的使命感和榜样作用。各种正在进行的,以及一些现有的关于欧美犹太组织的研究成果,都证明了圣约之子会的影响力不容小觑。^①在欧洲,圣约之子会组织这种独树一帜的模式在世俗犹太组织中算是一种全新的存在。

经过研究分析,1859 年在法国成立的以色列世界联盟 (Alliance Israel Universelle) 和 1893 年在德意志帝国成立的中央德意志党 (Centralverein deutscher Staatsbürger jüdischen Glaubens) 都没有广泛采用其成员的犹太身份来形成完善的组织策略,而圣约之子会则充分利用了其犹太组织的特质,较好地利用了其组织成员的自我意识和犹太使命感,促成了其成员的犹太身份和美国身份在宗教和世

^① Cornelia Wilhelm, *The Independent Orders of B'nai B'rith and True Sisters: Pioneers of a New Jewish Identity, 1843-1914*, p. 171.

俗方面的高度融合。^①这反映了圣约之子会组织的创新之处，同时也值得其他犹太组织学习和借鉴。

其次，圣约之子会团结犹太人的思想还体现在它对东欧犹太移民的看法上。众所周知，移民问题，特别是东欧犹太移民问题，一直是美国犹太人关注的焦点。早在美国限制东欧犹太移民事件发生之前，圣约之子会就曾表示过，诸如移民之类的弱势群体应该被适当的整合。帮助东欧犹太人解决移民问题，从一开始就成为了圣约之子会的目标。1881年，在东欧犹太人移民之初，限制移民入境危机出现之前，圣约之子会的执行委员会就表示过，它将解决移民的困难处境视为该组织的一项“经典”任务：“必须联络那些被迫站在边境线外面的人（东欧移民），促使他们分担我们的劳动和责任。他们的文化水平和道德观念越低，就越需要我们的帮助和支持。”圣约之子会还指出，“希望美国犹太人不要因为东欧犹太人移民前所处的民族环境而对他们持有偏见，必须禁止有人企图以这种理由制造犹太人分离的任何情况的发生。”^②由此可见，圣约之子会十分注重犹太人彼此之间的团结。

在东欧犹太人移民的过程中，美国犹太人虽然作为北美社会的主要支持者发挥着核心作用，但他们并不想做过多的宣传使“新移民”融入“美国社会”。这种情况表明了大部分美国犹太人在内心深处还是刻意在与东欧犹太人移民群体保持距离，主宰美国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同根同源的族群情谊，而是他们彼此间渴望分离。虽然他们拥有共同的民族传统，但是也存在现实方面的差异。而且，从圣约之子会的角度来看，组织对于东欧犹太移民的政策与其最初的目标是完全背离的，并打破了其最初的身份阶层原则。圣约之子会曾以近乎完美的方式实现了为美国犹太公民提供身份平台和受美国犹太人欢迎的发展目标，许多新成员加入该组织只是为了公开展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加速融入美国社会。

但是随着东欧犹太移民的到来，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它挑战了美国犹太人的社会融合度，同时也迫使美国犹太人根据东欧移民的社会融合度来证明他们这批早就抵达美国的犹太人的文化适应情况。圣约之子会成立最初的使命就是关怀和帮助其犹太同胞甚至全人类，而且创立者们将这种使命在组织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深化。所以，圣约之子会绝对不会对东欧犹太移民坐视不管，相反，它开始积在

^① Calvin Goldscheider, and Alan S. Zuckerman. "The Formation of Jewish Political Movements in Europe," *Modern Judaism*, vol. 4, no. 1 (February 1984), p. 94.

^②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Independent Order B'nai B'rith", pp. 90-91.

国际的、官方的、有效的行动框架内，积极寻求与宗教同源但文化相异的东欧犹太移民之间的团结一致，加速东欧犹太移民对美国文化的适应。^①这难免会让人觉得圣约之子会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版的“锡安主义”。

事实上，圣约之子会所体现的思想与锡安主义截然相反。锡安主义号召全世界的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故土，恢复本民族的生活方式，但圣约之子会却教育犹太人只需要继续做散居国外的别国公民和犹太同胞，并不会刻意强调犹太民族和民族独立等概念。该组织的精神超越了教条式的民族宗教对犹太人身份的定义，而是强调了全体犹太人更高的精神纽带，“活的犹太教”才是维系犹太民族关系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该组织为实现犹太公民身份，有意识地寻求建立一个全球联盟，促进传统犹太社区转化为新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后援力量。事实证明，这种身份与现实的散居犹太人的新公民理念相吻合，如今仍可以在 66 个不同国家的圣约之子会分会中找到。通过推广这一思想模式，该组织成为第一个超越地方边界，在国家与国际层面赋予犹太人以“犹太公民身份”的世俗犹太组织。它不仅是这一思想模式的先驱，而且是多年来唯一一个能够引导传统犹太社区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组织。

因此，圣约之子会重新定义了一种全新的有关现代犹太人身份和社区的模式。它秉持互助、团结的原则，以较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满足犹太社会的需求，使曾经散居国外的东欧犹太移民能够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并充分融入美国社会。与此同时，犹太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团结意识得到加强。通过这种方式，圣约之子会构建了一个现代的、跨宗教的、甚至跨国的犹太社区概念，就像犹太复国主义一样，它超越了宗教和种族认知的界限，加强了公民关系，从而在精神层面上团结了全世界的犹太人。

（二）改善了犹太人的生活状况

在 1830 年之前，美国规模很小的犹太社区都没有配备相应的犹太医疗机构，而 1850 年以前，美国几乎没有现代化的犹太医院。传统上，美国犹太人的医疗服务仍由社区的志愿团体组织 chevrah kadisha（希伯来文意思“神秘社团”）^②提供，这是一个按性别划分的兄弟会或姐妹会，致力于照顾患者、为逝者举办葬礼

^① Aschheim Steven, *Brothers and Strangers: The East European Jew in German Jewish Consciousness, 1800- 1923*,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p. 32.

^② [http://jhbchev.co.za/\[2022-11-27\]](http://jhbchev.co.za/[2022-11-27]).

和履行社区内的其他社会义务，并无专门的医疗机构。社区履行着照顾犹太同胞，甚至陌生人和旅行者的义务，但是它不提供医疗服务，只是为没有亲属照顾的病人提供基本帮助。除了病人，社区照顾的范围还包括老年人和孤儿，如果他们患病，则由社区为他们寻找医生给予治疗。

情况在 1850 年开始转变，这一年，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一家犹太医院开业了，它是美国第一家专门的犹太医疗机构。但是，它与传统的犹太社区医院仍然有许多相似之处；紧随其后的是 1852 年于纽约开业的犹太医院。这两个医疗机构都是为了应对 1849 年亚洲霍乱疫情而设立的，当时缺乏专业的医务人员。1854 年，因受犹太·图罗（Judah Touro）的遗赠，由医生约瑟夫·本萨·登（Joseph Bensa-don）指导的另一家犹太医院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开业了。^①19 世纪 60 年代，流行病的肆虐、现代医学的进步、移民带来犹太人口的增长，以及后来的美国内战，都强调了扩大专业医疗体系的必要性，一系列新兴的犹太医院应运而生。

几乎同时，圣约之子会的努力也启发了费城犹太医院的建设。1864 年 8 月 14 日，在第三区大分会的年会上，亚伯拉罕·苏兹伯格（Abraham Sulzberger）提出了在费城建立犹太医院的倡议，后得到了大会的批准。当时留下的会议记录显示，费城犹太人社区有意向纽约、辛辛那提甚至欧洲国家学习，尽快建立现代化新医院，并希望新医院建成以后，能够确保费城犹太人不会再被迫于基督教医院死亡，而是可以回归于犹太教仪式。^②这无疑给了身居他乡的美国犹太人一种心灵的慰藉。

19 世纪末，美国修订了公共医疗卫生政策，随着医学知识的丰富，医疗技术也得到了发展，这些促成了医院的医疗保健手段更加专业化，医院发展成为了现代医疗保健机构。慢性病患者、残疾人和老年人也可以被转移到专门的机构，得到专业的护理。与基督教患者占绝大多数的美国医院一样，犹太医疗机构的性质在此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欧洲同时期建立的医疗机构不同，美国犹太社区医疗机构的建立伴随着无比的热情、对市政医疗服务的责任感，以及犹太人作为美国公民想要为整个社会的利益做出贡献的独特自豪感。这一点在圣约之子会提倡建立的新型犹太医院中尤为明显，因为作为一个美国犹太组织，圣约之子会

^① Jewish Historical Publishing Company, *History of the Jews of Louisiana, Their Religious, Civic, Charitable, and Patriotic Life*, New Orleans: The Jewish Historical Publishing Company of Louisiana, 1905, p. 27.

^② Cornelia Wilhelm, *The Independent Orders of B'nai B'rith and True Sisters: Pioneers of a New Jewish Identity, 1843-1914*, p. 131.

希望在美国建立的犹太医院能激发所有犹太人对犹太身份的认同,促使他们承担起犹太人的公民责任。

圣约之子会作为首批参与建设犹太医院的美国犹太组织,不仅公开展示了自己在这些项目中的领导地位,而且表现出了它对犹太公民的责任意识和贡献精神。医疗保健是美国城镇犹太公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圣约之子会积极参与和分享其建设过程,有助于美国其他犹太组织学习圣约之子会的经验成果,携手构建“共享、现代、民主和有序”的美国犹太公民新生活。圣约之子会指出,美国犹太医院将免费向所有有需要的人开放,无论他们的国籍或肤色如何,这一点在当时得到了美国公众的热烈响应,这是该机构及其赞助者共同的期盼。美国犹太医院的创办人表示,作为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犹太人,他们想不受教派限制地献身于整个城市共同的福利建设,为犹太人争取新的美国公民权利奠定了里程碑,而圣约之子会无疑是建立这个里程碑的巨大贡献者。

圣约之子会延续了犹太民族传统的“泽达卡(Tzedakah)”精神,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捐赠。^①除了参与犹太医院的建设,圣约之子会还为生活困难或者收入有限的犹太人提供住房。这些住房的受益人主要以丧失劳动力的老年人为主,迄今为止,圣约之子会已在美国的28个社区建设了38处房产,共计拥有4500套优质公寓,极大地满足了部分犹太人的住房需求,圣约之子会也成为了美国最大的犹太补贴住房赞助商。^②

此外,圣约之子会通过其在世界各地的分会组织开展援助犹太人的各项行动,满足了犹太人和犹太社区的需求。在德国,圣约之子会致力于为所有年龄阶段的犹太学生提供现代化的优质教育,资助建立图书馆并推动书籍的出版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圣约之子会收养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并派遣医生和护士到军队中救死扶伤;在维也纳,圣约之子会制定了帮助妇女和孤儿的专项计划,创建了数十家保护中心,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收养了上百名孤儿;在以色列,自1888年第一个分会成立到今天,圣约之子会已经拥有70多个大大小小的分会。^③每个分会都有自己行动计划,比如帮助新到以色列的移民,为他们提供住所和食物,帮助贫困的大学生接受教育和寻找工作等等;在拉丁美洲,圣约之子会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巴西分会于1933年成立,迄今为止已有90周年的历史,而且在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家也能看到圣约之子会活跃的身影。组织积极与

^① 徐新:《追求公义——论犹太人的捐赠思想》,第53页。

^② [http://www.bnaibrith.org/\[2022-11-27\]](http://www.bnaibrith.org/[2022-11-27]).

^③ Ibid.

拉美国家的元首接触，并与当地的非犹太社区和组织开展合作，对改善拉美国犹太人的生活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三）增强了犹太人的身份认同

1850年至1875年期间，圣约之子会完善了其组织结构，增强了其使命感，将其组织机制系统化，成为了未来几十年里现代美国犹太组织发展的驱动力。在其组织的巩固阶段，圣约之子会的发展不仅受到欧洲犹太人持续移民美国的影响，部分还受到美国国内西进运动的影响。在1840年至1870年期间，共有大约14万讲德语的犹太人来到美国。^①起初，他们之中只有少数单身的男性或较为年轻的加入了美国的犹太教组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欧洲犹太移民的高流动性，以及他们经常无法找到合适的德国犹太人组织或者无法成为组织会员的事实。他们对美国文化适应的需要以及保持德国犹太社区传统的愿望，将他们与不断扩大的兄弟会运动联系在一起。

兄弟会运动为德国犹太移民提供了机会，让他们体验到了美国公民身份和犹太人身份是可以兼顾存在的，使他们牢牢地抓住了德国元素和犹太元素，同时也推动他们转变为一个具有民族意识和自我意识的美国犹太人。欧洲犹太移民的不断加入，以及他们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和组织观念，使圣约之子会组织出乎意料地在北美大陆上迅速发展起来，不久便成为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美国犹太组织。

而圣约之子会如何逐步成功地界定了美国犹太人在美国公共生活中角色，顺利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组织，并将犹太妇女纳入了这一机构，一直是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也是在1850年至1875年间，圣约之子会通过建立社区机构，成功地调节和整合了其内外结构，实现了其促进犹太人加速融入美国社会的目的。特别是在南北战争结束时，圣约之子会成功地激发和集中了宗教力量和公民意愿，使成员们能够认清自己作为美国犹太人的特殊身份。从圣约之子会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犹太人对其扮演生活在美国社会“特殊的角色”做出了尝试，并且在他们“美国化”的过程中得到了体现，使犹太人在承担其作为美国公民的新角色时能够更好地把握其群体特征，从而为他们在美国政体内发挥作用奠定了重要基石。

圣约之子会作为一个创新型的美国犹太人组织，受欢迎程度也越来越高，使它成为后建的其他美国犹太组织学习的典范。与以色列自由之子（Free Sons of

^① Avraham Barkai, *Branching Out: German Jewish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20-1914*. New York: Holmes and Meyer, 1994, p. 9.

Israel)、圣约·亚伯拉罕(B'rith Abraham)等组织相比,圣约之子会展现了其先进性和非凡的使命感。甚至与圣约之子会存在部分竞争关系的组织,如美国以色列人代表委员会,也不得不承认圣约之子会的潜力——它是促进犹太民族融合和实现美国犹太人理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以色列人代表委员会表达了其愿望,希望圣约之子会能够致力于维护美国犹太人的共同利益,而美国以色列人委员会本身则倾向于维护海外犹太人的利益,并且愿意就犹太人的利益问题与圣约之子会展开合作。^①美国以色列人代表委员会和圣约之子会等等的美国犹太机构和组织之间的持续合作,表明了美国犹太人在美国社会和公共领域中的相互融合和彼此认同。

此外,圣约之子会也想推动美国犹太人在认清自己的犹太种族身份,更好适应现代社会的同时,能够认识到自己作为美国公民的世俗身份,并通过一些美国犹太组织的帮助将他们融合起来。对于那些脱离了家庭生活和传统社区支持的流动青年移民来说,这些美国犹太组织十分有助于他们在保留自己犹太身份的同时,尽快地适应美国社会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组织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小缩影能够积极发挥作用,实现其本身和其成员的共同进步。

圣约之子会超越了自己的组织界限,形成了一股独特的力量,给非组织成员的美国犹太人也注入了使命感和开拓精神,加强了在美犹太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凝聚意识。圣约之子会不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组织,它还是各种犹太团体合作的平台。它作为唯一的公开存在的美国全国性的犹太组织,超越了其自身的价值,成为新犹太身份的焦点。为了做到这一点,圣约之子会调整了其部分结构,变成了一个大型的社会服务组织,成员逐渐增多,其中包括年轻的一代人,特别是在1914年以后,圣约之子会成功地融入了第一代美国出生的东欧犹太人,又一次地印证了其对美国社会的深刻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计划反倒使世界犹太人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面对无助的欧洲犹太同胞,美国和其他地区的犹太人纷纷施以援手,犹太人的团结抗敌精神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随着战争的结束,纳粹对欧洲犹太人实行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行为逐渐被世人忘却了。虽然战争的结束将欧洲犹太人从纳粹的恐吓和压迫中解放出来,但对他们来说,战后的和平只是表面的和平,战争的创伤使得他们的内心深处像墓地一样死寂。

希特勒虽未能摧毁全世界的犹太人,但他确实给欧洲犹太人社区带来了致命

^① Cornelia Wilhelm, *The Independent Orders of B'nai B'rith and True Sisters: Pioneers of a New Jewish Identity, 1843-1914*, p. 116.

的打击，尤其是曾经作为犹太人文化活跃中心的东欧犹太人社区。^①国际圣约之子会主席蒙斯基希望从战争的灾难中得到启发，企图建立一个更强大和有效的圣约之子会组织：一方面，他为在战争中受伤的东欧犹太人提供了各种援助，加快他们的身心恢复；另一方面，他将纳粹对东欧犹太人的迫害转化为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将一个分散的犹太组织转化为一个意识到需要团结以应对战后世界变化的犹太组织。

二、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一）影响了美国的犹太移民政策

东欧犹太移民问题一直是美国犹太人密切关注的问题，也是美国政治社会中的焦点问题。美国各个犹太组织都很关注东欧犹太人的动向，并想办法帮助他们移民，圣约之子会也不例外。1903年4月，在比萨拉比亚的基希涅夫发生了一场有组织的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美国犹太人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必须加快东欧犹太人移民的进程。1903年6月，以圣约之子会为首的犹太代表团决定去白宫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请愿，并试图将犹太人的命运与美国联系起来。^②在随后与总统举行的会议上，圣约之子会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即双方以条约联盟的方式行事。会后，白宫方面发表了声明，指出发生在东欧的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仅是全体犹太人的所关切问题，也是美国所关注的问题。罗斯福和圣约之子会的主要代表草拟了一份美国政府的临时声明，试图通过请愿的方式向俄国沙皇施加压力，希望俄国政府能对大屠杀事件作出回应。

临时声明中包含了请愿书的文本部分内容，介绍了请愿的主要关切点，请愿书通过某些渠道传递到了当时的俄国外交部长的手里。可是当圣约之子会正式询问俄国政府是否收到了请愿书，俄国政府对此官方声明的回应却是负面的，并拒绝接受美国政府和犹太人向俄国沙皇陛下提出的请愿要求。请愿活动最终于1903年10月结束，也注定了圣约之子会抗议活动的失败。可以说这口箱子都没有机会离开美国华盛顿，更不要说被运到东欧了。

请愿活动失败后，箱子被人从美国国务院直接运到了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在那里，圣约之子会等美国犹太组织为东欧犹太人所做的工作，便可以通过这口箱子在美国国务院第59号记录组所记录的那一栏中看到。这口颇具雕刻艺术气息的木箱里珍藏着数以千万个签名，甚至从视觉上看，更像是一份来自

^① Edward E. Grusd, *B'nai B'rith: The Story of a Covenant*, pp. 238.

^② Bernard Postal, "B'nai B'rith: A Century of Service", pp. 101-102.

18 世纪欧洲的文件。^①虽然请愿活动失败了，但圣约之子会对请愿活动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是不可否认的。

与圣约之子会的想法不同，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认为美国政府不仅应该向俄国政府发出“礼貌的”请愿，而且建议将犹太问题与美俄关系联系起来，对俄国政府施加真正的压力，这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希夫建议将俄国的反犹主义问题与前往俄国的美国犹太人的护照认可问题联系起来。护照认可问题反映了俄国歧视美国犹太人，没有将美国犹太人归到美国公民的范畴里，侧面印证了其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思想。然而，相比较于希夫的观点，美国政府却更加支持圣约之子会的态度——圣约之子会认为政府活动应该受到轻微的限制，从自身的立场方向出发，不必因为美国犹太人放弃任何政治立场。

1910 年，圣约之子会在美国的华盛顿特区举行大会，其仍然是美国政府以及共和党人的亲密合作伙伴。出生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美国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作为贵宾应邀参加了圣约之子会的宴会。第二天，塔夫脱在白宫接待了圣约之子会的所有代表，包括时任圣约之子会主席的西蒙·沃尔夫（Simon Wolf）。^②1912 年末，在经过复杂的程序后，沃尔夫成功地使得美国与俄国的商业条约被废除，从而满足了美国犹太人长期以来期盼的在俄国-犹太问题上能够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因此，可以说沃尔夫个人与塔夫脱的外交被誉为圣约之子会最大的成功之一。

有了这一次的成功之后，圣约之子会成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决定每年都颁发一枚年度奖章，授予在这一年中为犹太人做贡献最多的人。当年被授予勋章的人无疑是美国总统塔夫脱，在授予塔夫脱勋章之际，整个执行委员会都被邀请到白宫参加午餐会晤。不久，塔夫脱总统出现在纽约的犹太会堂，庆祝圣约之子会组织成立 70 周年。圣约之子会享受着这种由美国总统带来的威望，以及接下来和美国政府最高政治代表们的新接触。^③圣约之子会展示了其作为美国犹太人的榜样，受到了犹太同胞和美国政府的双重认可；同时，也反映了该组织自 1843 年成立以来的目标：积极致力于维护美国犹太人甚至世界犹太人的利益。

^① Petition of the Independent Order of B'nai B'rith concerning the massacre of Kishinev, RG 59, stack 250, row 1, compartment 1,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College Park, MD.

^② Bernard Postal, "B'nai B'rith: A Century of Service", pp. 109-110.

^③ Edward E. Grusd, *B'nai B'rith: The Story of a Covenant*, p. 145.

（二）提升了美国犹太人的政治地位

到了 20 世纪初，圣约之子会开始逐渐转变为一个现代的、面向全体群众的美国犹太组织。在世俗俱乐部重新流行起来的年代，几乎没有人还记得圣约之子会这个组织的起源。很少有人意识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国内发生的犹太公民身份的深刻内化，主要是由于圣约之子会肩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而提出的一系列倡议促成的。当时只有少数的犹太人，如曾担任德国第八区分会主席的利奥·贝克（Leo Baeck），身为一名柏林的拉比和自由派的犹太领袖，意识到了圣约之子会在美国独特的历史意义。1925 年 4 月，贝克参加了位于美国新泽西州大西洋城布莱斯市的制宪大分会的一次会议，回国后，他向他的德国犹太同胞们提起了关于圣约之子会组织的起源，深刻地描述了自 1843 年圣约之子会成立以来为美国犹太人所做的贡献。

圣约之子会最初成立的目的，就是接纳和援助所有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帮助他们打开通往犹太会堂的大门，引导他们进入美国的公共生活，圣约之子会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它引导着欧洲犹太移民在美国公共领域建立起一种平民化、世俗化的犹太身份，将美国犹太人置于了宗教化的犹太会堂之外的一个全新的领域。由于其独特的结构，该组织成功地为美国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提供了一个国家框架，使美国犹太人与美国民族的使命紧密相连起来。因此，美国犹太人可以明确地在其犹太裔美国公民生活中重新定义他们的种族、宗教和公民身份。

贝克犀利地描述了圣约之子会自十九世纪初创立到二十世纪为止，其思想仍然在各个分会中盛行和内化的受欢迎程度：圣约之子会所释放的现代化推动力，主要通过传播一种新的博爱理念以实现人类的理想来得到推进。它还塑造了一个犹太社会体系，包括犹太医院、养老院、孤儿院以及社区等机构。这些机构将美国犹太人作为一个族裔群体呈现在美国的公共生活领域，使他们在更广阔的社区范围内承担起作为美国公民的责任，并尽到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公民的义务。在这里，圣约之子会通过其内在的努力，加之外在吸收了犹太社区的积极元素，达到了建立现代化、有竞争力的、普遍的犹太组织的目标。

芝加哥著名的拉比埃米尔·G.赫希（Emil G. Hirsch）也曾指出，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社会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危机和秩序瓦解后，各个美国犹太组织才逐渐的恢复了交流，比如，危机使得圣约之子会和美国希伯来教会联盟（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s）之间建立了更紧密的关系。这有助于圣约之子会在美国宗教界的“社会福音运动”以及整体的“进步运动”的框架

内确定新的动机和目标,以便犹太进步势力再次在美国公共领域中发挥作用。^①除此之外,圣约之子会还成功地将犹太人的身份与美国新教以及其它世俗化运动的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支持了犹太人在美国形成代表权。^②通过这种方式,圣约之子会在帮助美国犹太人和犹太社区融入美国政体的过程中,成功地发挥了其独特的领导作用。

回顾圣约之子会的发展过程,就是在探究一个美国犹太组织的成长历程:该组织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以及它如何慢慢适应了美国的社会生活,并通过参与各项活动扩大其在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的。在这个过程中,圣约之子会不仅增强了美国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且还改善了美国犹太人的生活条件。同时,作为一个拥有一定影响力的庞大组织,圣约之子会的领导人和主要成员也活跃在美国政坛之中,既实现了其犹太移民目标,又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美国犹太人的政治地位。

^① Cornelia Wilhelm, *The Independent Orders of B'nai B'rith and True Sisters: Pioneers of a New Jewish Identity, 1843-1914*, p. 259.

^② J. J. Goldberg, *Jewish Power: Inside the American Jewish Establishment*, p. 109.

结 语

事实证明，圣约之子会是一个包容度极高的组织，它不仅支持美国和以色列社会中的犹太个人、宗教机构和种族群体，也同样支持美国甚至全世界的非犹太团体，并将维护公民权利视为自己更为宏大的宗旨和使命。这些体现了圣约之子会对于公民社会、人权事业等的国际化甚至理想化的目标，以及对犹太人生活在美国这个全新的国家，享受全新的政治气息而充满的信念，所有这些理念在圣约之子会成立早期就曾表述过。圣约之子会组织的发展历程也印证了其确实将自己的理念融入到了各项活动中，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在圣约之子会不断成长的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附属机构，反诽谤联盟是圣约之子会众多附属机构中的一个，其诞生是圣约之子会进步思想在意识形态上深化的表现，并将该组织最初保护犹太人权利的想法带入了 20 世纪。除了反诽谤联盟之外，圣约之子会青年组织和圣约之子会妇女会等附属机构，同样受到了美国甚至世界人民的极大欢迎。此外，在世界各地不断建立的组织分会也是圣约之子会“冲出美国、走向世界”，进一步发展壮大表现。组织以其诞生地美国为起点，不仅在老牌犹太人聚集地德国、新兴犹太国家以色列建立了分会，在欧洲各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甚至是拉丁美洲的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国家也能见到其分会组织活跃的身影。

圣约之子会秉持着犹太人一贯的慈善传统和救济理念，将其组织精神付诸实践，积极筹划和参与各项活动。首先，组织致力于改善犹太人的生活，在美国和其他犹太社区开设了医院、孤儿院，并为老年人提供住房；其次，组织经常实行人道主义救援，帮助在火灾、洪水、霍乱中受害的犹太人；再次，组织十分关注犹太人的教育问题，不仅为犹太青少年设立了希勒尔基金会，而且为犹太成人出台了职业培训计划；最后，组织捍卫新兴犹太国家的权利，在以色列建国前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奔走，在以色列建国后支持新兴的犹太国家自卫，并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

随着圣约之子会在世界各地扩展，组织的发展理念也得到了深化，它的服务范围不再局限于犹太人。圣约之子会在早期就将其设立的图书馆定性为公共建筑，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共同开放。在圣约之子会建设的医院里，不仅犹太人能够获取治疗，非犹太人也能得到救治。在圣约之子会后来的老年住房计划中，它不再考虑宗教和种族因素，非犹太人也能享受这种福利。

而圣约之子会作为一个 1843 年就建立的美国犹太组织，曾参与过美国的南北战争，并协助美国在二战中取胜，其成长是与美国社会的发展相伴进行的。反过来，圣约之子会的许多行动也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政策，比如美国政府对待东欧犹太移民的态度，甚至是以后的苏联犹太人斗争。况且，圣约之子会是犹太移民在北美大陆孵化的产物，作为一个拥有近两百年悠久历史的老牌犹太组织，它的组织模式和创新成果无疑是值得借鉴学习的。

参考文献

一、英文文献

（一）英文著作（按作者姓名字母排序）

- [1] Aaron Berman, *Abba Hillel Silver, Zionism and the Rescue of the European Jews*, ed. Paula Hy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Center for Israel and Jewish Studies, 1979.
- [2] Anti-Defamation League, *Pro-Arab Propaganda in America: Vehicles and Voices*, New York: Anti-defamation League of B'nai B'rith, 1983.
- [3] Anti-Defamation League of B'nai B'rith, *Questions and Answers Concerning the Jew*, Privately Published, 1942.
- [4] Aschheim Steven, *Brothers and Strangers: The East European Jew in German Jewish Consciousness, 1800- 1923*,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 [5] Avraham Barkai, *Branching Out: German Jewish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20-1914*. New York: Holmes and Meyer, 1994.
- [6] Ben V. Dwoskin, *Soci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Affiliation or Non-affiliation in the B'nai B'rith Hillel Foundation of Selected College Students*, Ann Arbor: Pro Quest LLC. , 1950.
- [7] B'nai B'rith, *A Manual of Operations*, Washington: B'nai B'rith Institutes of Judaism, 2019.
- [8] Charles Reznikoff, ed., Louis Marshall: *Champion of Liberty*,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57.
- [9] Cornelia Wihelm, *The Independent Orders of B'nai B'rith and True Sister: Pioneers of a New Jewish Identity, 1843-1914*, Michigan: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10] Deborah Dash Moore, *B'nai B'rith and the Challenge of Ethnic Leadership*,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1.
- [11] David S. Wyman, *Paper Walls: America and the Refugee Crisi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68.
- [12] E. Michael Jones,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Jews*, South Bend: Fidelity

- Press, 2015.
- [13] Edward E. Grusd, *B'nai B'rith: the Story of a Covenant*,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96.
- [14] Ismar Schorsch, *Jewish Reactions to German Anti-Semit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 [15] Jaclyn Granick, *International Jewish Humanitarianism in the Age of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 [16] Jacob Riis,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New York: Hill & Wang, 1957.
- [17] Jehuda Reinharz, *Fatherland or Promised Land: The Dilemma of the German Jew*,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5.
- [18] Jewish Historical Publishing Company, *History of the Jews of Louisiana, Their Religious, Civic, Charitable, and Patriotic Life*, New Orleans: The Jewish Historical Publishing Company of Louisiana, 1905.
- [19] John Higham, *Send These to Me: Jews and Other Immigrants in Urban America*, New York: Atheneum, 1975.
- [20] J. J. Goldberg, *Jewish Power: Inside the American Jewish Establishment*,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1996.
- [21] Leonard Dinnerstein, *The Leo Frank Cas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 [22] Hasia R. Diner, *Jews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23] Hasia R. Diner, *The Jews of the United States (1654 to 2000)*,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24]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America*,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2013.
- [25] Mamie G. Gamoran, *The New Jewish History: From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to Our Own Day*, New York: The 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s, 1966.
- [26] Maurice Bisgyer, *Challenge and Encounter*, New York: Crown, 1967.
- [27] Morris Adler, *The Objectives of the B'nai B'rith Institutes of Judaism*, Washington: B'nai B'rith Department of Adult Jewish Education, n.d.
- [28] Naomi Cohen, *Not Free to Desist*,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72.

- [29] Richard Hofstadter, *Age of Refor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
- [30] Robert Edward Edmondson, *B'nai B'rith: An International Anti-Christian, Pro-Communist Jewish Power*, New York: John Merrick Church, 1937.
- [31] Robert H. Williams, *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 and Its Use in the World Communist Offensive*, Santa Ana: Williams Publications, 1949.
- [32] Samuel S. Cohon, *Jewish Reference Book: B'nai B'rith Manual*, London: Forgotten Books, 2018.
- [33] Selma S. A. Lewis, *Biblical People in the Bible Belt: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Memphis, Tennessee, 1840s- 1960s*, Macon: GA: Mercer, 1998.
- [34] Sigmund Freud,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ed. Ernst L. Freud, trans. Tania and James Stern, London: Hogarth, 1961.

（二）英文论文（按作者姓名字母排序）

- [1] Alfred Jospe, “The B'nai B'rith Hillel Foundations”, *Religious Education*, vol. 48, 1953.
- [2] Allon Gal, “Israel in the Mind of B'nai B'rith (1938–1958)”,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vol. 77, no. 4 (June 1988).
- [3] Bien, “History XVII”, *Menorah*, October 1887.
- [4] Calvin Goldscheider, and Alan S. Zuckerman, “The Formation of Jewish Political Movements in Europe”, *Modern Judaism*, vol. 4, no. 1 (February 1984).
- [5] Cmk, “B'nai B'rith International Admits Women”, *Off Our Back*, vol. 20, no. 10, (November 1990).
- [6] Corinne A. Krause, “Mexico: Another Promised Land”, *American Jewish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 61, no. 4 (June 1972).
- [7] Dennis B. Klein, “Sectarianism and Universalism in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unpublished article.
- [8] Edward E. Grusd, “B'nai B'rith Hails the New State”, *National Jewish Monthly*, June 1948.
- [9] E. E. Aubrey, “Questions and Answers concerning the Jew by Anti-Defamation League of B'nai B'rith”,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vol. 23, no. 4 (October 1943).
- [10] Isidor Busch, “The Jewish Orphan Asylum, Cleveland O.”, *Menorah*, July 1888.

- [11] Jack Wertheimer, “The Founding of the ADL”, unpublished paper.
- [12] Lloyd P. Gartner, “B’nai B’rith. The First Lodge of England. A Record of Fifty Years”,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25, no. 3 (July 1963).
- [13] Louis L. Mann, “B’nai B’rith Hillel Foundations”, *Religious Education*, vol. 26, 1931.
- [14] Marco R. Newmark, “Wilshire Boulevard Temple: Congregation B’nai B’rith 1862-1947”,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Quarterly*, vol. 38, no. 2 (June 1956).
- [15] Moshe R. Gottlieb, “Reactions of American Jewish Defense Organizations to the Liquidation of the B’nai B’rith in Nazi Germany”,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45, no. 3/4 (Summer-Autumn 1983).
- [16] Moshe R. Gottlieb, “The Anti-Nazi Boycott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Ide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Appreciation”,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35, no. 3/4 (July-October 1973).
- [17] Myer Steinglass, “Palestine Unites American Jewry”, *B’nai B’rith Magazine*, March 1936.
- [18] Rabbi Harry Essrig, “Cultural Program of Hillel Foundation”, *Jewish Education*, vol. 18, 1947.
- [19] Rabbi Harry Kaplan, “The Hillel Foundation as Educator”, *Religious Education*, vol. 25 (May 2006).
- [20] Sam Beber, “The Birth of AZA As I Remember It”, *The Shofar*, May 1974.
- [21] S. Z. Madni, “B’nai B’rith (Sons of Covenant)”, *Strategic Studies*, vol. 6, no. 4 (Summer 1983).
- [22] Thomas David Mantel, “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 of B’nai B’rith”, *Harvard University Honors Thesis*, 1950.
- [23] Trude Weiss-Rosmarin, “There Is Cause for Optimism”, *National Jewish Monthly*, January 1947.
- [24] William Toll, “Voluntar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Portland Jewry: The B’nai B’rith in the 1920s”,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 10, no. 1 (January 1979).

（三）年鉴、报刊、档案

- [1] Abram L. Sachar, “The B’nai B’rith Hillel Foundation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e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vol. 47 (1945-1946).
- [2] The B’nai B’rith Survey, “Jewish Student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e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vol. 50 (1948-1949).
- [3]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Improved Order B’nai B’rith”, *The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vol. 2 (September 24, 1900 to September 13, 1901).
- [4]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Independent Order B’nai B’rith”, *The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vol. 2 (September 24, 1900 to September 13, 1901).
- [5] Bernard Postal, “B’nai B’rith: A Century of Service”, *The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vol. 45 (September 30, 1943 to September 17, 1944).
- [6] Arnold Dashefsky & Ira Sheskin,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2013*, vol. 113,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4.
- [7] Emanuel Friedlein, “Tw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Emanuel Lodge, UOTS”, *Jewish Times*, April 28, 1871.
- [8] Kaufmann Kohler, “Der Beruf des Weibes”, *Jewish Times*, May 21, 1875.
- [9]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nstitution Grand Lodge, “Dispersing the Ghetto”, IOBB, IOBB Archives; Glazier, 1901-2, 15-19.
- [10]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nstitution Grand Lodge of the IOBB, 1873, 31ff., IOBB Archives.
- [11] Petition of the Independent Order of B’nai B’rith concerning the massacre of Kishinev, RG 59, stack 250, row 1, compartment 1,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College Park, MD.
- [12] Leo N. Levi to George Peixotto, April 24, 1903, Drawer 8, Letters, IOBB Archives.

二、中文文献

（一）中文专著（按作者姓名拼音排序）

- [1] 李伟建：《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年。
- [2] 刘军：《美国犹太人：从边缘到主流的少数民族群》，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 [3] 潘光：《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1978-2008》，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年。
- [4] 潘光，汪舒明，罗爱玲：《犹太在美国：一个成功族群的发展和影响》，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 年。
- [5] 潘光、余建华、王健：《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年。
- [6] 徐新：《犹太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 [7] 徐新、凌继尧：《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 [8] 张倩红：《以色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
- [9] 赵伟明：《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 年。

（二）中文译著

- [1] [奥]西奥多·赫茨尔：《犹太国》，肖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年。
- [2] [美]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徐方、阎瑞松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 年。
- [3] [美]雅各·马库斯：《美国犹太人 1858-1990：一部历史》，杨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
- [4] [以]弗雷德·A. 拉辛著：《美国政治中的苏联犹太人之争：透视以色列与美国当权派的关系》，张淑清、徐鹤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
- [5] [英]阿伦·布雷格曼：《以色列史》，杨军译，上海：中国出版集团，2009 年。
- [6] [英]诺亚·卢卡斯：《以色列现代史》，杜先菊、彭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

（三）中文期刊论文（按作者姓名拼音排序）

- [1] 弗雷德·A. 拉辛、张迎迎：《美国苏联犹太人运动中的基督教神职人员：对全国苏联犹太人问题跨宗教工作组的初步研究成果》，《宗教与美国社会》2015 年第 1 期。
- [2] 姜淑令：《浅析美国犹太人对美以关系的影响》，《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 年第 11 期。
- [3] 黄陵渝：《犹太人的宗教习俗与外在标志》，《世界民族》2004 年第 3 期。

- [4] 王瑞：《浅析美国犹太人对美以关系的影响》，《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
- [5] 汪舒明：《试析犹太人在美国政治影响力提升的策略》，《世界历史》2010年第6期。
- [6] 汪舒明：《战后美国犹太组织的“群际关系运动”及其影响》，《史林》2017年第5期。
- [7] 汪舒明：《犹太人在美国政坛的崛起》，《中国民族报》2011年9月16日。
- [8] 徐新：《追求公义——论犹太人的捐赠思想》，《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四）硕博论文（按作者姓名拼音排序）

- [1] 戴燕玲：《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历史透析——以领导权视角为中心（1906-1929）》，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 [2] 郝冬：《美国犹太人对美以关系的影响》，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 [3] 孙铭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对美以关系的影响》，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 [4] 杨阳：《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关系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 [5] 朱闪：《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研究（1914-1953）》，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三、网络资源

- [1] <http://www.bnaibrith.org/>
- [2] <http://jhbchev.co.za/>
- [3] <http://www.adl.org/>